

汉口城堡铺出中山大道

1926年宋庆龄首度莅临汉口南洋大楼，坊间追述她的脚步“踏上了中山大道”，未免有些浪漫超前。那时候，这条大街还叫后城马路呢，而且只到江汉路。江汉路那边蜷入旧五国租界，分别叫湖北街、亚历山大街、亚尔萨罗南尼街、西贡街、复兴街、汉景街、平和街，有的隔出栅栏各占一半，有的越界圈地逼近铁路，曲折延伸着武汉人的憋屈。

1864年，汉口最北端修建汉口城堡，从硚口到沙包（今一元路）。1906年，张公堤竣工，卢汉铁路通车，两道长龙锁住后湖之水，城堡拆除，墙基筑路，因濒临后湖而称后城马路。1929年纪念孙中山，更名为中山马路。1946年庆祝抗战胜利，再更名为中山大道。

中山大道不像汉正街仅在华界，也不像胜利街只在租界，而是跨越华洋两界，历经清朝、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贯穿硚口、江汉、江岸三个城区，一如大汉口动脉，脉动百年风华。江岸段欧陆风情，江汉段民国时尚，硚口段共和国质地，三种“文化层”交织绵延，造就别具一格的都市画廊。

与共和国一同长大的武汉伢，享受中山大道的流风遗韵，更目睹它的转型更新。起初，硚口至六渡桥，一色的低矮板房茅屋，就算老法院有点模样。幸得“一五”计划实施，服务于新兴工业区，硚口百货大楼、硚口区委礼堂、硚口公园、军工医院、军需俱乐部应运而生。顺势而下，新华电影院、工艺大楼、无线电商店、卓娅副食商店、五金交电商店沿线崛起，一大波公共建筑亮出新姿。

更有长江大桥开建，江汉桥率先跨越汉水，打通武圣庙，修筑武胜路，出现一个新十字街口。1970年代，十字街口竖起新华书店大楼和船舶大厦，五马路两旁新建6层住宅高楼，谈炎记水饺也迁入新店堂。

美食最为亲民，中山大道最为集中，那些老字号真叫海纳百川：北京春明楼、天津德华楼、江苏小扬州、浙江五芳斋、四川蜀味春、广东冠生园、湖南福庆和、本帮老会宾，还有东来顺、靠墙泰、菜根香、野味香……清真、西餐、素菜、野味全齐了。至于汉味小吃，更是当仁不让：四季美汤包、老通城豆皮、蔡林记热干面、顺香居烧麦、郭铭泰锅贴、一品香大包、民生糊米酒，外加老万成酸梅汤，怎么都过瘾。

娱乐最为红火，中山大道老剧场扎堆，各家剧团各有专属，评剧和平、汉剧清芬、楚剧长乐、越剧天声、话剧中南，无处不是戏窝子。一个民众乐园，京剧、豫剧、杂技、说唱、木偶干脆蹲守不走，一票会百戏，锣鼓响通宵。

时风流转，2016年地铁接驳中山大道，水塔城市博物馆、武汉美术馆、吉庆街美食城颜值一新，串起江汉路和黎黄陂路，营造城市人文引力场。

春风初拂，2026年中山大道命名80周年、开建120周年，迎来新一轮城市更新浪潮。媒体最新消息说，“楚宝片”商街激活文脉，百年老万成旧貌回归，将与民众乐园、南洋大楼、汉口总商会、甲子大旅馆相呼应，构建六渡桥“热岛轴心”。

中山大道，武汉人的一份老骄傲，经得起岁月淘洗，当得起“打卡新宠”。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 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 伟 胡 蓉

唐云峰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 玮

编 辑：许 濛 章旷怡

封 面 设 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汉口城堡铺出中山大道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1996，武汉市科技智囊团担当“外脑” / 王 钢

风雨同舟

<<< <

10 “作为中国公民，我在抗战中尽了一份责”

/ 邹崇芬（口述） 车 璇 涂静怡（整理）

九城同心

<<< <

13 古瑶与茶：龙窖山区的文化共生 / 冯晓光

委员天地

<<< <

20 破译生命密码，守护健康起点

/ 何学莲（口述） 银 华（整理）

24 在仓埠，种出一片未来 / 杨丹建（口述） 金梦梅（整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26 恰同学少年，“造梦”路上再“造脑” / 邓彪

都市寻踪



- 30 江汉关博物馆建设纪略（上） / 李笙清 彭建
35 法文游记中的晚清武汉“水上城市” / 吴敏
39 老武汉年俗童谣：过年 / 彭翔华

人物述林



- 43 黄陂清代榜眼刘彬士的题匾与墓碑 / 裴高才 杜春华
49 武汉起义将领张轸相关史实补正 / 张胜林

往事漫忆



- 52 就读武汉市实验小学的美好时光 / 张智海
58 1994年，偶遇“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永曦 / 罗建华

扫街探疑



- 62 黄鹤楼古铜顶和胜像宝塔二谜 / 张胜仪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28日

定 价：8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96，武汉市科技智囊团担当“外脑”

◇ 王 钢

轮印：30年。1996年2月8日，武汉市科技智囊团成立，面对现代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把握“九五”计划开局契机，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助力武汉“科教立市”擘画蓝图。

在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内各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发展态势下，武汉坚持“科教立市”的基本市策，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1996年新春伊始，武汉科技智囊团组成强大阵容，发挥人才优势，筑牢智力支撑，推动科技进步创新和产业提质增效，加速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成为助力政府科学决策的核心力量。

“跨世纪科技行动”抢占制高点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科技事业蓬勃发展。1987年，武汉市第七次党代会确立“科

教立市”的基本市策，科技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1993年，武汉市列为全国科技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1994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制定《武汉市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启动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六大计划”，促进全市科技“大合唱”形成态势。1995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具有战略意义的全市科技大会，决定组织实施“跨世纪科技行动”，增强武汉科技综合实力，加速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

“跨世纪科技行动”是武汉加速科技进步的动员令，又是贯彻“科教立市”的行动纲领，对于推动武汉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落实武汉“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意义重大。

“跨世纪科技行动”的总体目标，就是



1991年12月，武汉市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研讨会”

围绕武汉国民经济发展以钢铁、汽车、机械、高新技术四大支柱产业为主体，强化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绿色技术五大领域的技术创新，推动“先导、支柱、振兴、双星、绿色、繁荣”六大计划的深入实施，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形成基本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

实施“跨世纪科技行动”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一个高水平智囊咨询机构呼之欲出。

190名专家构成“思想库”

为了荟萃高端英才，共商改革发展大计，早在1983年5月，武汉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高水平的咨询委员会（1991年更名为决策咨询委员会），特聘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担任主任委员。这个智囊团由32名委员及工业、交通、农业、财贸、科教等8个专业咨询组的86名成员组成，将专家的学识、智慧与领导层的决策相结合，就武汉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对促进武汉重大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施“科教兴市”，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惟楚有材，于斯为盛。1996年初，武汉地区已拥有博士生导师517人，分布在31个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他们掌握一批重要技术源头，具有人才优、学科多、专业广、信息新、学术水平高等特点。鉴于这一科技人

才优势，武汉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市科委）经请示市委、市政府同意，于1996年2月8日成立以博士生导师为主体的科技智囊团，以开发各领域科技人才资源，让科技成果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快武汉科技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完成跨越世纪的科技行动。

武汉第一届科技智囊团共聘任190人，阵容强大，人才济济，荟萃了各专业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其中博士生导师160人，占84.2%；来自产业部门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30人，占15.8%；整体平均年龄54.5岁，其中40岁以下的16人。中国驻联合国前大使、著名国际法学家、武汉大学兼职教授黄嘉华出任名誉团长，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朱耀庭、武汉大学副校长李卫华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余杭、微生物学专家沈萍、经济学院教授辜胜阻、法学专家曾令良、有机化学专家黄素秋，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曲候、粒子物理研究所教授蔡勖，中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教授颜日初，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教授张正禄，湖北中

“跨世纪科技行动”迈出重要一步**武汉市科技智囊团成立**

本报讯（记者 陈光）190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武汉市科技智囊团，昨日宣告成立。他们及其所带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将优先在武汉进行转化。

据悉，智囊团的主要任务有：不定期、不定形式地为武汉

市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在选择研究课题时，积极向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重点和关键技术靠拢。

科技智囊团成员中，博士生导师占84.2%，另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产业部门有实践经验的高级科技人员。智囊团成员平均年龄54.5岁，其中40岁以下16人。

按专业统计，190名专家分布于120余个学科和专业，涵盖了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行业和领域，特别注重选择了一批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绿色技术等5个重点技术领域的专家进入

智囊团，以促进“钢、车、机、新”4大支柱产业的发展。

中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武大兼职教授黄嘉华出任智囊团名誉团长。团长、副团长分别由华中工大的朱耀庭教授、武大的李卫华教授出任。据悉，智囊团成员采用聘任制，每届聘期2年。

市委副书记刘善璧称，未来15年内武汉市将深入贯彻“科教立市”基本市策，组织实施“跨世纪科技行动”，成立科技智囊团使这项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武汉市将为智囊团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各类科技发展计划及有关科技管理部门将给智囊团以优先支持。

力市场选址武汉

介绍，为了尽快建成武汉劳动力市场，国家劳动部已拨款，由世界银行800万美元专项贷款本月也据权威人士称：这个劳动力市场年底运作。

1996年2月9日《长江日报》报道

医学院院长张六通，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桂建芳，武汉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鲁功成，同济医科大学教授姚伟星、陆再英、闻良珍、陈道达，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教授李必强等纷纷加盟智囊团，可谓群星闪耀。

科技智囊团的专家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年富力强、实干敬业，有的还兼任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会员，构成一个高水平的政府决策“思想库”。

按专业统计，科技智囊团的190名专家，分布于120余个学科和专业，涵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行业和领域。为契合武汉“跨世纪科技行动”的总体目标，推动科技优势与产业发展共融共生，这些专家分为信息与电子、机械工程、生物工程、农林牧渔、材料与化工、医药卫生、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经济与管理、能源工程9个学科组，尤其注重选择一批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绿色技术五个重点技术领域的专家进入智囊团，以促进钢铁、汽车、机械、高新技术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

科技智囊团的主要任务有：不定期、不定形式为武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在选择研究课题时，积极向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重点和关键技术靠拢，市科委将尽力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并通过各类科技计划优先予以支持；积极将智囊团成员及其所带研究生从事的科研成果，优先在武汉市进行转化。

科技智囊团的活动方式，以各学科组分别活动为主，每年至少活动两次，由学科组长

召集。智囊团成员采用聘任制，第一届聘期两年。遴选智囊团成员的原则，根据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智囊团成员身体、年龄情况而定。



武汉市科技智囊团名誉团长黄嘉华

武汉市委、市政府对科技智囊团寄予厚望，时任市委副书记刘善璧提出，未来15年内武汉市将深入贯彻“科教立市”基本市策，组织实施“跨世纪科技行动”，成立科

技智囊团使这项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武汉市将为智囊团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各类科技发展计划及有关科技管理部门将给予智囊团优先支持。

1996年是武汉“九五”计划开局之年,也是武汉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的一年,一系列重大科技决策部署相继出台,《武汉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颁布实施。同时,国家科委批准武汉为全国首批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应用工程示范试点城市;武汉市科技项目评估部成立,在全国率先开展科技项目立项评估的试点工作,这些举措构成武汉优化科技环境、专家献策咨政的战略布局。

多学科聚合发力谋大计

针对武汉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科技智囊团不负重托,以智慧才干凝聚合力,以开拓务实尽显担当,提出许多建议和咨询报告,为武汉科技发展的科学决策、重点前沿技术的导航、新兴技术产业的规模发展贡献卓著。

科技智囊团作为一个多学科专家的集合体,注重发挥集体智慧,在研究重大课

题时,先把相关专业学科的专家聚合在一起,即以各学科组活动为主,发动专家从不同角度广泛研讨,再集中加以归纳总结,形成具体解决方案,为领导决策提供“外脑”服务。

“武汉地区有20余位院士、500多位‘博导’,每年有1000多项科技成果问世。而我们的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却显得活力不足。症结何在?”面对疑问,1997年1月30日,科技智囊团经济与管理组的19位专家齐聚湖北大学,为之出谋献策。他们认为,必须高度重视软科学即管理学,因为管理上不去,人才和技术就无法变成现实生产力。武汉大学科技情报专家马费成教授举例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一次科技会议上谈到,他的很多头衔都可以不要,但“经济管理教授”不能丢。

中南财经大学博导李贤沛、武汉大学教授李光提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中国沿海一些地区已开始重视软科学的决策、咨询、管理功能,1995年对软科学研究的投入,深圳已达200万元,福建省更为300万元,而武汉为50万元,仅占每年“科技三项费”

· 2 · 1997年2月4日 星期二

长江日报

本报讯(记者朱汉华)“武汉地区有20余位院士、500多位‘博导’,每年有1000多项科技成果问世。而我们的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却显得活力不足。症结何在?”

上月30日,武汉市科技智囊团经济与管理组的19位专家聚会湖北大学,为武汉市发展出谋献策。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高度重视软科学即管理学。道理很简单:管理上不去,人才和技术无法变成现实生产力!

武汉大学科技情报专家马费成教授讲了一件事: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一次科技会上曾谈到,他的很多头衔都可以不要,但“经济管理教授”不能

科技智囊团19位专家新年献计

依靠软科学 发展大武汉

丢。中国要靠科教兴国,但当务之急是“管理救国”。48岁的马费成“博导”认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

湖北大学副校长陈继勇“博导”对武汉市近几年科技产业流失颇有感触。他保留着“丽珠得乐事件”、“碧菲斯现象”等详细的资料。前不久,武大数学系一批专家研制出“国

际互联网(Internet)商用密码系统”,又面临无人投资的窘境。陈继勇决定把这个项目引到湖大来继续开发。他呼吁:武汉应该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良性机制,让好的科研成果能留在武汉,变成“汉货精品”。

中南财大李沛贤“博导”和武汉大学李光教授谈到,西方

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我国沿海一些地区已开始重视软科学的决策、咨询、管理功能。如深圳去年对软科学研究的投入已达200万元,福建省为300万元。而武汉市的此项投入为50万元。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每年4000万元的“科技三项费”中,软科学竟只占2%

的份额。

军事经济学院教授王增祥和他的同事们近两年在武汉柴油机厂推行管理改革,成效显著。洋专家格里希在此任职时,武柴每年创效益30万元,而现在变成了600万元。技术还是那些技术,说明了中国管理专家的水平不比洋专家差。王增祥认为,企业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决定着企业的发展。

武大62岁的余杭教授向市科委副主任毛锦文坦陈:身为市科技智囊团成员,我有“无功受禄”之愧,也有“有力无处使”之憾。他的吁请代表了与会专家的心声:重视软科学,依靠软科学,发展大武汉。

1997年2月4日《长江日报》报道

的很小部分。由此，提议武汉市增加对软科学的投入。

武汉军事经济学院教授王增祥，与同事一起到武汉柴油机厂推行管理改革，成效显著。1984年至1986年，德国专家格里希担任厂长时，武汉柴油机厂每年创效益30万元，而此间增至600万元。技术还是那些技术，说明中国管理专家的水平并不比洋专家差。王增祥据此认为，企业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决定着企业的发展。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余杭既是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又是武汉市科技智囊团成员，他的呼吁代表了与会专家的心声：重视软科学，依靠软科学，发展大武汉。

鉴于武汉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科技产业时有流失，特别是武汉大学数学系专家刚研制出的“国际互联网商用密码系统”面临无人投资的困境，湖北大学副校长陈继勇呼吁：武汉应该建立科技转化生产力的良性机制，让好的科研成果能留在武汉，变成“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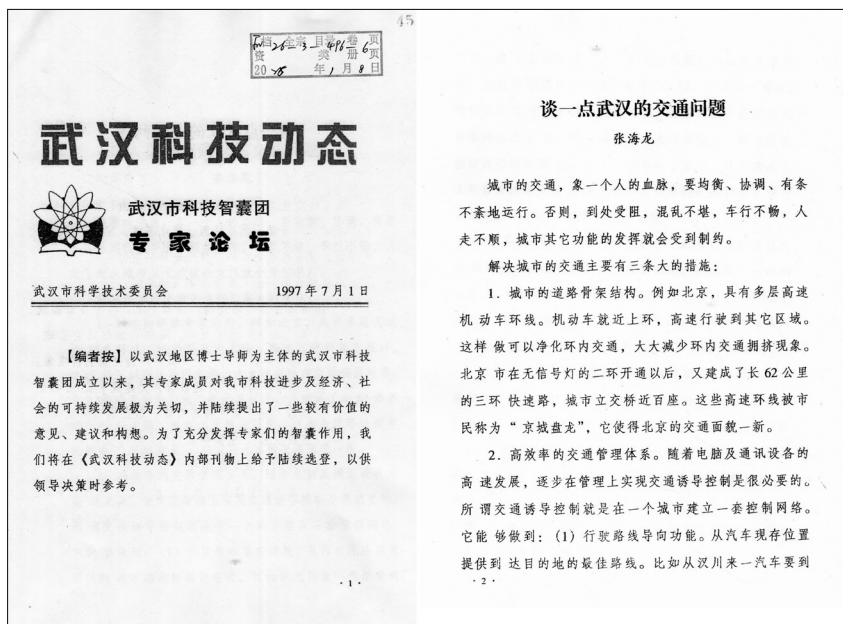
货精品”。为了科技成果不外流，他决定将该项目引入湖北大学继续研发。

为了更好地展现政府智库的职能作用，武汉市科协在其内部刊物《武汉科技动态》开辟“武汉市科技智囊团专家论坛”，集中选登智囊团成员的真知灼见，以供领导决策时参考。

针对武汉城市交通问题，武汉城市建设学院桥梁工程专家张海龙发表《谈一点武汉的交通问题》咨询报告提出：要借鉴美国、法国等国交通拥挤、市中心趋于衰落的经验教训，以及北京具有多层高速机动车环线的优势，创建武汉城市的道路骨架结构、高效率的交通管理体系、多层次的交通运输方式，根据自身特点发展地铁、高架桥、地面交通、轻轨等，尤其要把发展大容量公共客运系统规划放在优先地位；武汉三镇各自建立中心商贸区（CBD），在CBD内建立步行街，严禁机动车驶入步行街，特别是禁入具有文化遗迹和一定特色的区域，保护城市原有风貌，完善社区服务功能，解决由于三

镇隔江鼎立，居民购物要去汉口，学习、办事又要到武昌的状况。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是城市的生命线。为顺应现代电脑及通讯设备的高速发展，张海龙提议在城市建立一套控制网络，在管理上实现交通诱导控制。其一具备行驶路线导向功能。从汽车现存位置提供到达目的地的最佳路线。“比如，从汉川来一汽车要到青山，进入控制系统之内，系统会根据目



《武汉科技动态》开辟“武汉市科技智囊团专家论坛”

前地面交通现状，指引司机按最佳路线到达青山”；其二实现信息服务功能。向司机提供交通事故、交通堵塞、行驶时间、道路状况等各种动态信息，再与路线导向功能相结合，向司机提供应选择的新路径。

“比如，前面有了堵车，这个信息会立即被系统通知给各处车辆，使得欲过此路口的车辆行走他处。”

张海龙有关武汉优先发展大容量公共客运系统、建立无信号灯的多层高速机动车环线、分区设立中心商贸区（CBD）和步行街区，以及构建具有导航功能的交通管理体系等规划设计，契合了现代化城市交通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颇具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如今已一一变为现实。

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激烈竞争，武汉的机械工业如何走出困境？1998年3月，市科协吸纳科技智囊团专家的建言，形成《发展武汉机械支柱产业对策研究》报告，向市政府建议：主攻环保成套设备制造业，得到政府的采纳。

可以说，每一份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高质量决策咨询，都是科技智囊团专家对武汉科技进步及经济发展的深切关注与理性思考，凝聚着他们用心血与智慧践行“跨世纪科技行动”的责任担当。

继科技智囊团之后，一批又一批政府智库在武汉不断涌现。

1998年，武汉市政府聘请22位国际名家为顾问，组建武汉市国际咨询顾问团，推进武汉城市发展的国际化进程。

2004年，为整合高级专家资源，由武



2009年4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左）为湖北（武汉）院士咨询服务（活动）中心揭牌

汉各界277名专家组成的武汉市高级专家协会宣告成立。

2009年，湖北（武汉）院士咨询服务（活动）中心揭牌，聘请29名知名院士、国家级专家担任委员，成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强有力智力支持。

在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征程中，武汉市科技智囊团等智库，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咨政建言，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为城市建设擘画蓝图，利在当代，惠及将来……

王钢，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武汉市地方志专家库成员

“作为中国公民，我在抗战中尽了一份责”

◇ 邹崇芬（口述） 车璇 涂静怡（整理）

人物名片：邹崇芬，民革党员，黄埔军校第15期防化科毕业生，曾担任军政部防毒教官。

我1920年生，湖北汉川人，1938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5期，专业是防化科。1940年从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军政部防毒处，主要负责防毒知识的培训和防毒器材的调配。1983年，我加入民革，曾任第六届武汉市硚口区政协委员，现为武汉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

（一）

我出生于武汉，青年时期就读于武汉文华中学，那时上课一听到警报响起，就拿起

书本往防空洞跑，一天要跑好几趟。我们很想读书，但战事一天天吃紧，在学校被多次轰炸彻底炸没后，被迫中断学业。老师流着泪告诉我们：“课上不了了，要记住这国仇家恨！”

我亲身经历了武汉抗战时期的惨烈：日军空袭导致“馥和茶馆被炸，数百人遇难”；在一次空袭中，12名女同学仅1名生还；整个城市一度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目睹了国家的破碎和同胞的苦难，我深知，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仅仅依靠知识是无法拯救国家的。于是，我决定投笔从戎。

1938年5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武汉街头看到黄埔军校招收国防技术军官的招生广告。我怀揣着报国之志毅然报考，从武汉280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国



2019年9月28日，湖北省暨武汉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欢会现场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第四期干部训练班录取的38人之一。随后，我辗转南京学习，后被编入黄埔军校第12期泸州本校独立第一大队防化科。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中国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摇篮，而防化科则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需求，从第12期开始设立的。二战期间，国际公约规定不允许使用生化武器，日本侵略者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多次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

那时候中国军队对生化武器很陌生，日军使用催泪瓦斯后，心理威胁极大，严重影响士气。防化科的主要学习任务是培训防毒人员和供应防毒器材，这对于在战场上减少部队因毒气攻击而遭受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二)

经过两年系统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我逐渐成长为一名防化专业人员。1940年

下半年，我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军政部防毒处（驻重庆），主要负责系统培训各部队的防毒军官，以提升其在防毒方面的专业能力，通过军官对士兵的进一步培训和普及，弥补部队在防毒知识方面的不足。

1942年，我曾短期被派驻到泸州纳溪县（今泸州市纳溪区）。在此期间，我十分注重与当地百姓的沟通 and 交流，积极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和喜爱。

还记得我们的驻地两边都是山，日军飞机贴着山谷飞进来，飞行员甚至探出身子张望。可为了不暴露目标，就算敌机飞得再近，我们也不能开枪，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挑衅。有一次日军轰击泸州时，炸毁了我们驻地附近的一大片树林，一个大池塘的水都炸干了。轰炸过后的满目疮痍让人触目惊心，那种锥心之痛让我至今不能忘怀。

同年，我和我的小组接到首个重要任务，是在湖南桃源设立专门的防毒训练班，负责为湖防部队（湖南洞庭湖驻军）培训专



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摄于家中

业的防毒军事军官。然而该计划因日军持续空袭被迫中断，小组随即转赴湖北宜昌三斗坪，为江防部队提供防化支持，为保卫江防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任务完成后，我调回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负责整个战区和各部队的防毒器材的供应和调配工作。1945年2月，又调任江防部队第39军暂编第51师，担任师部防毒组长兼防毒连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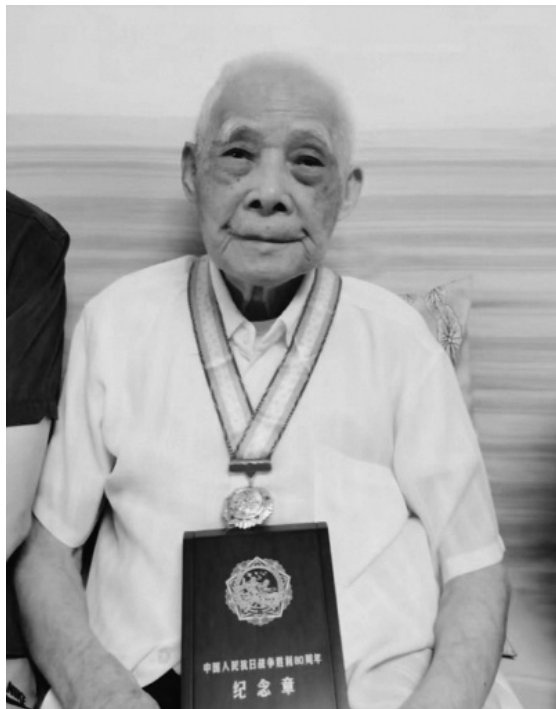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与战友从广播中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街头民众敲锣打鼓、彼此相拥庆祝，这喜悦让我至今难忘。历经漫长战火，这一刻，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和平的来之不易。

（三）

解放后，我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1953年，我任武汉电镀厂会计，直至1982年9月才离开岗位。

2005年和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向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及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70周年纪念章。我两次获得了这样的纪念章。

我在抗战时期虽未直接参与一线战斗，但通过后方培训，普及防毒知识，区分毒气与烟雾（如催泪瓦斯毒气识别、湿毛巾防护法），有效缓解了部队“恐毒”心理，也为增强战士的战场生存力尽了一份力。时至今日，我还常向子女讲起抗战时期在防毒处的经历，向他们讲述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四万万同胞奋起抵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故事。多年来，他们耳



2025年8月，邹崇芬在家中接受长江日报采访

濡目染，这种情感深刻影响着家庭成员对国家、民族的认知。

回顾过往，我的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但值得欣慰的是，作为中国公民，我参加了抗战，尽了自己的一份职责。现在我虽然已高龄，但仍每日关心国家大事，尤为期盼台湾问题早日解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那一天。

古瑶与茶：龙窖山区的文化共生

◇ 冯晓光

元末明初，湘鄂边界的龙窖山流传着“牛角分节”的传说：十二姓瑶人将牛角锯为十二节，各持一节，相约五百年后重回故地相聚。这一传说，深刻反映了瑶族的迁徙记忆与故土情结。龙窖山古瑶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关于世外桃源的历史记忆，蕴含一套与石头共生的生存智慧，体现一系列独特的信仰表达，更展现一种至今流淌的文化活力。

龙窖山：古瑶文化的发祥地

龙窖山位于湘鄂两省交界，属幕阜山余脉，主峰海拔 1261 米。山区涵盖湖南省临

湘市羊楼司镇龙窖山村、文白村，詹桥镇壁山村，以及湖北省通城县大坪乡内冲村，崇阳县沙坪镇石坳村，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柳林村、羊楼司等地，总面积约 200 多平方公里。因明清时期通城一带流传有李氏三姐妹采药救人的传说，故又名药姑山。

三苗是远古时期活动于洞庭、鄱阳湖之间的古族。考古显示，三苗实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主体。多数学者认为，今苗、瑶民族与岳阳、武昌、九江一带的古族有渊源，而龙窖山正处其中心地带。

龙窖山留存大量古瑶文化遗存，被认定为瑶族早期家园——千家峒。“峒”指山谷平地，古时常用于指称少数民族聚居地。

古瑶人几十户至上百户为一“峒”，设峒长管辖，“千家峒”即意味曾有成百上千户瑶民在此聚居。山区至今保留诸多带“峒”古地名，如赤壁的“马家峒”“羊楼峒”。民间有传说称，“羊楼峒”系由“瑶楼峒”音转而来。

《盘王大歌》里的《十二姓瑶人游天下》是对瑶族迁徙史的全面记述，其中唱到：“瑶人出世武昌府，满目青山到处游，龙头山上耕种好，老少乐业世无忧。”有学者指出，唱词中的“龙头山”即指龙窖山。

唐大历三年（768），杜甫漂泊至洞庭湖一带，见当地瑶民（莫徭），作《岁晏行》：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夫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此诗证实中晚唐时期湘鄂交界一带确有瑶民居住。

《岳阳甲志》载：“龙窖山在巴陵北，山势峻极，上有雷洞、石门之洞，山瑶居之，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龙窖山为幕阜山向丘陵过渡地带，历史上系汉瑶杂居区，后因战乱，瑶民渐南迁至湖南、广西等地。临湘、

通城、赤壁、崇阳一带，可谓古瑶文化的发祥地。

寻根“千家峒”：瑶族精神家园

《千家峒歌》在瑶族民间传唱千年，“千家峒”被视为民族的精神圣地，但关于其地理位置，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瑶族学者李本高与黄钰于1987年发表《瑶族“千家峒”故地辨析》，提出“千家峒可能在洞庭湖沿岸”的观点。此后李本高又撰《瑶族漂洋过海析》，进一步推测其在洞庭湖与幕阜山之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本高翻阅大量史料，在《岳阳甲志》《岳阳风土记·临湘篇》中看到有关“龙窖山区曾是瑶族居住地”等相关记载。

2000年4月，李本高应邀参加中国（广西）瑶学会在南宁召开的《瑶族通史》编委会会议。与会人员认为，瑶族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图腾崇拜、漂洋过海、千家峒、



龙窖山垒石文化遗址

迁徙等仍然模糊不清，有必要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编委会最后决定，于2001年在瑶族最早的故乡——湖南，召开“瑶族历史重大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返湘后，李本高立即将会议情况向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瑶族通史》顾问邓有志汇报，并提出“临湘市龙窖山可能是瑶族‘千家峒’”的设想。邓有志高度重视，说：“湖南是瑶族最早的故乡，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弄清楚瑶族漂洋过海、千家峒、迁徙的问题，给全世界瑶胞一个满意的交待。”随即决定与李本高一同前往临湘实地考察。在初步走访后，邓有志认定：从龙窖山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看，这里可能就是瑶族最早的“千家峒”。

根据邓有志的提议，临湘市委、市政府领导决定进一步开展龙窖山的调研考证工作。由市政协牵头成立专门的调查组，查阅大量史料，并深入龙源乡的各个村寨及毗邻的湖北通城、崇阳进行实地考察。龙源乡政府专门成立了“瑶族寻根挖掘领导小组”，动员广大群众寻找和保护古瑶遗存。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调查组在龙窖山和毗邻的湖北通城、崇阳，先后发现了由古老石块砌成的石门、石梯、屋基、梯土等瑶族遗迹。

2000年12月，湖南省民委听取汇报后，认为遗迹与《千家峒歌》高度吻合，支持进一步考察。半个月后，邓有志再次带着李本高等一行四人到龙源乡进行第二次考察。这次他们在古塘、朱楼坡和漆坡区域，看到古井、古塘、娘头、石梯、石门、瑶人坟、吊脚楼遗址等瑶族遗迹，并找到白石岭、三江口以及九所三关等与瑶族《千家峒歌》所载相吻合的地名。考察完后，邓有志说：“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千家峒。”

2001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

副主席、《瑶族通史》编委会主任奉恒高，和自治区民委原副主任盘朝月赴湖南，李本高又陪同第三次前往临湘市龙源乡考察。考察中，再次发现了石墙屋、冲墙屋、古井、畚家山等与瑶族有关的遗迹，以及无人居住的千家坪、胡家屋场等遗址。考察完后，奉恒高说：“亲眼看到龙窖山瑶族遗迹，这里确实像‘千家峒’，很有研究价值。瑶族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眉目更清晰了。”

2001年9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广西）瑶学会、临湘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临湘市政协承办的“湖南临湘瑶族专题学术研讨会”在临湘召开。来自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北京等地的瑶族研究专家近50人出席会议，对瑶族千家峒、漂洋过海、迁徙等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研讨。通过实地考察和论证，一致认定：临湘龙窖山就是瑶族早期的“千家峒”。

2002年1月20日，临湘市政协收到中国（广西）瑶学会寄来的《龙窖山千家峒认定意见书》，权威认定：“龙窖山千家峒风光绮丽，生态环境良好，瑶族遗迹众多，规模宏大，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极其少见、极其珍贵的瑶族文化遗产。”此后，临湘市将位于羊楼司境内幸福村的瑶族先民堆石文化遗址，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北咸宁及有关县市也在加强对龙窖山区的古瑶文化研究。2006年2月，距离通城25公里的药姑山（龙窖山），被瑶族历史研究专家确认为瑶族先民遗址。通城县在调查中发现，仅大坪乡境内，就有垒石房屋基址、石井、石梯田（瑶田）、石墓葬、石寨、石桥、石神庙、石祭祀台等遗迹760余处。2014年，在“中国通城瑶族千家峒问题座谈会”上，药姑山与龙窖山同为瑶族

历史上早期“千家峒”（精神家园与发祥地）的结论得到进一步确认。通城县的大坪乡内冲瑶族村，乡民们至今保持着对瑶祖盘王的信仰，不吃狗肉，而且古建筑遗存上还有狗图腾的雕塑。

2017年9月，崇阳县组建三个调查组，分别赴瑶族祖居地龙窖山（药姑山）脉区域内的肖岭乡、沙坪镇、石城镇、路口镇、高枥乡等5个乡镇8个村组，开展瑶文化遗迹、传说、故事的调查。仅一周时间，调查组就发现500多处石文化遗存，包括石屋、石井、石窖、石板路、石凉亭、石梯地、垒石堆等。特别是在崇阳县境内，找到了《十二姓瑶人游天下》中唱到的“龙头山”。

龙头山距通城县大坪乡内冲瑶族村、临湘市羊楼司镇幸福村瑶族堆石墓遗址，直线距离均不超过10公里，属龙窖山区瑶族文化核心区域。2018年12月，知名瑶文化专家、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宫哲兵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这才是瑶族龙头山”的结论。

赤壁则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联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成“古瑶文化”调查工作专班，重点对赵李桥镇、官塘驿镇逾230平方公里的范围开展调查。其中在马家峒、柘坪、瓦瑶山等深山腹地，也发现垒石屋、石墓、石凿水渠、垒石梯田

等古瑶文化遗存，其“垒石文化”的遗迹与通城、崇阳等地发现的类型相似，是古瑶先民生产生活的痕迹。

湖北省民协副秘书长万立煌指出：“古瑶文化指元明以前生活在鄱阳湖、洞庭湖与幕阜山一带的三苗后裔所形成的融合文化，表现为瑶田汉耕、瑶茶汉采、瑶俗汉袭，具有鲜明的地域融合特征。”咸宁市民协主席定光平认为：“咸宁古文化渊源于三苗文化，汉瑶杂居使许多瑶俗被汉人沿袭，形成独特的文化印记。”

从瑶山到茶乡：羊楼洞的融合之路

龙窖山不仅是古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历史上重要的茶叶产区。五代十国后蜀毛文锡所著《茶谱》载：“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宋《太平寰宇记》载：“鄂州蒲圻、唐年诸县，其民……唯以种茶为业。”宋范致明所著《岳阳风土记》载：“（龙窖山）



清末民初的羊楼洞（陈启华摄）



服饰与瑶民相似的清代羊楼洞茶农

山极深远，其间居民谓之鸟乡。语言侏离，以耕畬为业，非市盐茶不入城市邑，亦无贡赋，盖山瑶人也。”这充分证明，唐宋时期龙窖山及周边地区，有瑶民种植的大量茶园，以茶为重要生计。

《千家峒歌》唱道：“爱吃香茶进山林，爱吃细鱼三江口。”据对羊楼洞茶区和龙窖山区实地考察可见，这里的山头多为“土山”而非“石头山”，适宜植茶。由于古代生产力落后，人们一直“以食为天”，为了生存，田畈、丘陵地区都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茶园则主要分布在山上。而开辟羊楼洞茶区这片核心茶园的主人，就是龙窖山区的原住民古瑶民。

古瑶民虽被称为山瑶或过山瑶，但需与山下的汉族居民贸易方能生存。除了山货之外，茶叶应是瑶民与汉族居民交易的最大

宗物品，因此瑶民才把山顶都种上了茶叶。

历史上的龙窖山区，被多个知名茶业集镇所环绕，具有代表性的有湖北蒲圻（赤壁）羊楼洞、崇阳大沙坪和小沙坪、湘鄂交界处的羊楼司、湖南临湘的聂市。鄂南古镇羊楼洞，不仅是青砖茶和米砖茶发源地，也是被国际茶叶委员会命名的“世界茶业第一古镇”和“万里茶道重要源头”。羊楼洞于明清之际迅速兴盛，既因地理气候优势，亦得益于本地悠久的种茶传统与成熟茶园基础。

如今，龙窖山区还有大面积的垒石野茶园和古茶树。不难想象，整个龙窖山腹地，

在数十年前、数百年前甚至千年前，曾是成片的茶园。这些遗迹显示，瑶族先民曾在此开荒种茶，繁衍生息。羊楼洞茶区后来的辉煌，与古瑶民有着深厚的渊源。

历史上的羊楼洞茶区，包括鄂南的赤壁、崇阳、通城、通山、嘉鱼、咸宁、大冶、阳新等县以及湖南的临湘、平江，江西的修水，其核心地带几乎与龙窖山重叠。由于羊楼洞是国内外著名的茶叶贸易集散与制造中心，从而形成了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农村商贸特区。

羊楼洞成为“两湖茶产制造中心”，有纬度、气候因素，有土壤因素，有历史上茶业基础因素，更有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特殊地理原因。龙窖山区的通城、临湘、崇阳产茶区，都曾有连接羊楼洞的古茶道。临湘羊楼司镇梅池村存千年银杏，旁有深壑古茶道

通往羊楼洞。当地居民回忆：“茶叶从此路经马家洞运往羊楼洞加工。”朱楼坡附近存同治二年（1863）路碑，载有各村派工修路、违者罚款的规约。

笔者在考察中发现临湘、崇阳、赤壁交界的龙窖山区腹地有一段“堤坝”，这“堤坝”明显是人工建造的。古人为了避免上山下山艰辛，也为了缩短路程，所以修建这些“堤坝”，就如两山之间架起的桥梁。在临湘市漆坡附近的一处半山处，还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右往洋楼洞，左往洋楼司”。这是一块难得一见的路碑。根据碑文字体和风化程度，石碑设立时间应该是清末民初。

位于赤壁市与崇阳县交界处的塔坳岭，是古代崇阳、通城、临湘通往羊楼洞的茶道上的一个重要隘口，在山顶上还形成了一个集市，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崇阳县还在此地设有林业站、茶叶站等机构。

在接近塔坳岭的古茶道上，有一个非常别致的泉水，井上有神龛，传说这口泉水一次可供百十人饮用。当年的茶农挑着茶担，走着几十里的山路，能在这儿喝上一口清甜的泉水，也算是上天的恩赐。整个龙窖山区，遗存着断断续续、残缺不齐的石板台阶，当年的茶农，挑着茶叶，从这些古茶道赶往羊楼洞。

龙窖山历史上称呼不一，通城人称“药姑山”，巴陵人（岳阳、临湘）称“龙窖山”，崇阳人称“龙头山”，赤壁人则称“松峰山”“芙蓉山”。因龙窖山在不同县市有不同称呼，故龙窖山茶、药姑山茶、松峰茶、芙蓉茶等均为羊楼洞茶区茶叶中的一个茶名。羊楼洞及周边羊楼司主要茶叶产地有上百处，其中朱林坳、十字坳、芙蓉山、柳林铺、百花岭、官石、尖山、山荆等处都地处龙窖山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湖北的李先念曾将羊楼洞茶叶带进北京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边喝边说：“好茶！是哪里产的？”李先念回答说：“是蒲圻产的。”毛主席也爱喝临湘的龙窖山茶，杨开慧烈士的兄长杨开智在临湘龙窖山茶区每年定制数十公斤优质茶送给毛主席。实际上，临湘龙窖山茶和羊楼洞茶就生长在同一座山上。

1961年，湖南省歌舞剧团演员、临湘籍人王长安及其丈夫作曲家白诚仁，将临湘龙窖山区民间艺人袁延长演唱的《卖茶歌》歌词改编，并将歌名改为《挑担茶叶上北京》。这首歌后经歌唱家何纪光演唱而广为流传。可以说，整个羊楼洞茶区也是湖南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的发源地。

公元6世纪，龙窖山周边的茶叶就随着商队的驼队，沿“丝茶之路”传入中亚。明清之际，“丝茶之路”完全变成了“砖茶之路”，茶叶远销欧亚。作为古瑶文化发祥地与万里茶道源头，龙窖山成为瑶文化与茶文化高度融合的典型样本。

活化与新生：古瑶茶文化的当代传承

近年来，湘鄂两地积极推进古瑶文化与茶文化的保护与活化，形成一系列文旅融合项目。

湖南临湘率先设立龙窖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并于2025年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龙窖山老龙潭景区已投资升级改造，打造“梅池村瑶族特色村寨”，开发茶马古道徒步、瑶文化体验路线，举办瑶文化之旅。源自瑶歌的“临湘喻琴戏”，已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湖北通城于2009年设立内冲瑶族村，建设“古瑶第一村”景区与陈列馆，该村



作者在考察古瑶山寨遗址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及“湖北省瑶文化之乡”。当地拓宽公路、改造民居,形成民俗街。瑶风《拍打舞》早在1988年就荣获湖北民间歌舞金奖,后列为省级非遗并获全国少数民族艺术节金奖。

湖北赤壁整合古瑶与茶文化,改造羊楼洞明清古街,复建咸丰年间厘金局,内设清代官员硅胶像,还原历史场景。文献记载,厘金局唐准经曾协同周边州县剿平龙窖山匪患,受朝廷嘉奖。赤壁亦筹划建设“峒乡茶谷”景区,并将与古瑶习俗相关的脚盆鼓、柘坪锣鼓申报省市非遗。

湖北崇阳也在积极规划,计划将雨山垒石梯田遗址,打造成“有故事可讲、有场景可看、有体验可感”的沉浸式文旅项目,让游客亲身感受古瑶族在生产生活中的智慧。

2018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咸宁市为“中国古瑶文化之乡”,命名通

城县为“中国古瑶文化传承展示基地”,并在湖北科技学院建立中国古瑶文化研究基地。中国政协副主席程建军指出,古瑶文化对研究民族史、民族迁徙史具有重要价值,未来研究要把视野放开,把文化研究融入到生产生活中,让更多的人知晓和传承历史风云里的古瑶文化。

2026年1月咸宁市两会期间,笔者提交提案,建议统筹通城、赤壁、崇阳三地资源,由省或市级主导,高起点规划龙窖山古瑶文化生态旅游度假区。同时建议三地联合调查、整合遗址,打包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化瑶文化与茶文化融合研究,挖掘故事内涵,为文旅发展提供支撑;并与湖南临湘龙窖山度假区开展跨省合作,建立协同运营机制。

今天,古瑶文化正从厚重的史册与沉寂的石迹中苏醒,在湘鄂边地的绿水青山间焕发新生。

冯晓光,赤壁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副主任

破译生命密码，守护健康起点

◇ 何学莲（口述） 银 华（整理）

人物名片：何学莲，江岸区政协委员、区侨联主席，武汉儿童医院遗传与精准医学中心主任。

我期望每个患病的孩子都能被及时诊断、温柔治疗，盼望每个家庭都能拥有健康宝贝的欢声笑语，更希望从生命源头阻断缺陷的阴霾。而出生缺陷防控这门融合临床医学、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复杂学科，恰让我的学术积淀与从业经历找到了完美的交汇点，使我得以用所学所研所行，为生命健康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新加坡实验室里，找到一生的方向

我出生在一个医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从小就对生命科学充满好奇。1993年，我从

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如愿踏上从医之路。然而，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并非发生在病房，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实验室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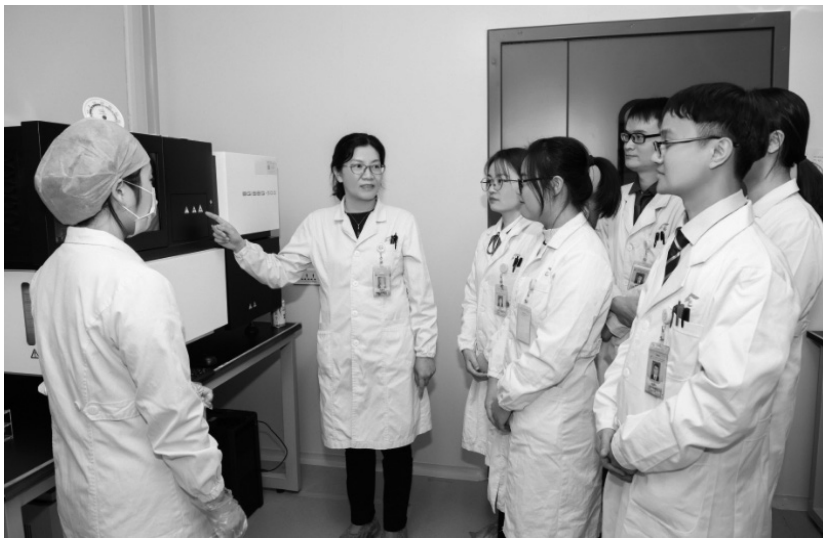
那时，我与先生前往狮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硕博学位。我的研究方向本是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学，属于比较前沿的基础科研。实验室的生活规律而单纯，经费充足，可以心无旁骛的进行学术研究。但我内心始终萦绕着一丝若有所失，自己毕竟是临床医生出身，手中的试管与显微镜，似乎离病人的苦痛、离那些家庭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有点远。我常常想起在临床轮转时所看到的：那些因先天性疾病而陷入困境的孩子和父母们。

在我隔壁的实验室，是一位临床医生领导的团队，他们专注的正是产前诊断和地中

海贫血等遗传病的筛查。那时候，基因检测还是非常新颖的事物。我看着他们通过抽取羊水、分析基因，能够明确诊断胎儿是否患有重型地贫，从而帮助家庭做出选择。那种运用科技手段，直接干预，甚至改变一个家庭未来轨迹的“力量感”，深深震撼并吸引了我，让我看到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那座可以连接的桥梁。我意识到，将遗传学的知识应用于临床，尤其是从生命起点就守护健康，预防出生缺陷，是一件多么精准又有大爱的事！

面对未来的道路，我几乎没有犹豫。2008年，我和先生决定回国发展。我向当时武汉儿童医院的领导讲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筹建一个实验室，不满足于传统的病理或检验，而要专注于利用基因技术，为出生缺陷的遗传学诊断与预防开辟新路径。令我感动和至今感激的是，医院领导给予了超越我想象的信任和支持。他们说，医院需要这样前瞻性的探索。就这样，我从零起步，开启了武汉儿童医院精准医学实验室的筹建之路。后来，实验室与院内优生与遗传实验室整合，逐步发展为如今的遗传与精准医学中心。这颗种子，终于在故土生根发芽。

回国之初的挑战远超想象。从花园城市的整洁有序，到武汉建设热潮中的忙碌节奏；从国际化科研环境的顺畅高效，到重新适应国内的人际与办事模式；从收入水平到生活便利度，都存在许多落差，需要慢慢适应。我像刚毕业的学生般重新摸索，在领导的期待与肩头的责任中迅速调整状态。



何学莲与其研究团队

团队从无到有，技术从一代基因测序针对少数罕见病，到高通量测序覆盖孕前、产前至儿童期的全周期筛查，我们一步步构建起完整的出生缺陷防控体系。这中间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过程艰难。但当第一个因为我们的基因检测而终于明确病因、结束了漫长辗转求医之路的家庭，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谢时，那种强烈的满足感和价值感，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这一切都让我深深感到，我回来了，并且找到了能将我的科研背景、临床知识和内心深处那份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完美结合的坐标——为妇女儿童筑起一道基于遗传学的、防患于未然的健康防护墙。

守护生命起点，见证观念变迁

回国之初，精准医学在国内儿科领域尚属新鲜事物，大众甚至许多非专科医生，对基因检测和遗传病的认识非常有限。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普”和“破案”同时开始。

早期遇到的病例往往格外曲折。我还记



何学莲接诊患者

得曾接诊一位因“小头畸形”和发育迟缓就诊的可爱女孩，常规检测无法找到原因。最终线索指向了看似健康的妈妈，她是一位未被诊断的苯丙酮尿症携带者，异常的代谢产物影响了胎儿发育，导致孩子生长发育和智能发育的落后。另一个家庭，第一个孩子患有一种严重影响智力的遗传病“粘多糖贮积症”，他们想要健康的二宝，却因孩子已接受过骨髓移植而无法获取其原始基因样本。我们创新性地利用指甲等组织，成功追溯出致病基因，最终帮助他们通过产前诊断迎来了健康的新生儿。

当然，这类疾病通常是父母各自携带一个隐性致病突变，同时传给孩子才会导致发病。只要通过基因检测明确父母的携带情况，就能为他们提供科学的生育指导。

还有许多令人惋惜的案例。陕西一对夫妇，第一个男孩两岁仍不会爬、坐不稳，智力落后，头颅核磁共振提示小脑萎缩。夫妇认为男孩不行，便想再生个女孩，以为不会有事，没想到女儿一岁后出现了和哥哥同样的症状。他们辗转来到武汉儿童医院，经基因检测确诊为“婴儿神经轴索营养不良”。

这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夫妇双方均携带致病突变，每次怀孕孩子都有 1/4 的患病概率。

这些案例在当时颇具代表性，暴露了公众乃至基层医疗对遗传病认知的匮乏。许多家庭是在孩子出现明显异常后，才历经辗转找到我们，错失了最早的预防或干预时机。

然而，近十几年来，我深切地感受到公众观念的巨大变化。随着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和医学科普的深入，公众的健康意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在孕前、孕期主动咨询遗传风险。武汉市将无创产前基因筛查纳入免费民生项目，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们实验室从最初每年有限的检测量，发展到如今承担全市大量筛查与诊断任务，每年进行大量检测，明确诊断各类遗传病数百例。

更令人欣慰的是临床医生观念的改变。早年，向患儿家属解释为何要做基因检测，往往需要花费大量口舌。如今，越来越多的儿科、产科、甚至基层医生有了“遗传视角”，遇到不明原因的发育迟缓、多发畸形或家族性疾病史时，会主动建议进行遗传咨询与检测。这种诊疗观念的进步，使得许多遗传病得以更早、更准确地被识别出来。

实验室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拥有临床、遗传咨询、生物信息分析和实验室技术的完整团队。不仅能够进行常规的染色体和基因包检测，更建立了强大的数据分析与解读能力，能够对一些复杂病例和罕见变异进行深

入的功能分析与研判。从跟随技术潮流，到如今在儿童遗传病诊断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优势，我们每一步的成长，都伴随着社会对生命起点健康日益增长的重视。

履职建言，让科学关怀惠及更远

除了作为一名医生和实验室负责人，我还是江岸区政协委员和区侨联主席。这些角色促使我走出诊室和实验室，去思考如何将个体病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转化为系统性的社会建议，让守护的边界得以延伸，惠及更多人群。

临床所见所感，推动我拿起笔，撰写了一份份提案。在《关于加强骨龄监测儿童生长发育的建议》中，我提出将简单、经济、辐射量极小的骨龄拍摄，纳入中小学体检或作为重点宣传的自选项，让家长能及时了解孩子的发育节奏，避免因“晚长”的误解而错过干预时机。在《关于将遗传病携带者基因筛查纳入产前筛查降低出生缺陷的建议》中，我详细阐述了为何“每个人平均携带3-4个隐性致病基因”，以及通过孕前筛查预防单基因遗传病（其综合发病率实际高于唐氏综合征）的必要性和社会效益。

我呼吁政府能参考免费无创产前筛查的成功经验，逐步将针对严重致残致畸疾病的扩展性携带者筛查，纳入公共卫生项目，从源头上降低出生缺陷。此外，我还特别关注“如何让孤独症患者等特殊儿童接受教育”“加强出生缺陷与罕见病防治和相关人群的帮扶”等问题，通过提案的方式，建议从医疗救助、康复教育、社会融合乃至心理支持等多个层面，构建一个更包容、更有温度的支持网络。

作为侨联主席，我亦尝试搭建平台，汇

聚侨界力量。我们组织座谈，倾听侨企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需求与困难；我们也希望连接海内外的医疗资源与智慧，共同为提升妇幼健康水平努力。我始终相信，医学的进步离不开社会的理解与协同，而守护妇女儿童健康，更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行动。

回顾从2008年至今的这段旅程，我深感个人的选择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我有幸亲历并参与了国内，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儿童精准医学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全过程。从最初大众对基因的陌生，到今天许多家庭主动寻求科学备孕、精准防控；从实验室的艰难起步，到建成一个能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诊断与咨询中心，这条路上充满了挑战，更充满了意义。

在这里，我的所学、所思、所能，以一种更直接、更接地气的方式，作用于我深深关切的土地与人群。我亲眼见证并参与了一个前沿科室从蓝图变为现实，见证了一代代年轻技术人才的成长，更见证了无数家庭因为我们的工作而重拾笑容。这份事业带给我的成就感和扎根于斯的幸福感，无比厚重。

医学的道路永无止境，未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可能。但无论技术如何飞跃，医者的初心始终不变：尽我所能，运用科学的力量，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减轻家庭的负担。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健康起跑的权利，而帮助父母实现拥有健康孩子的朴素愿望，就是我最神圣的使命。

在仓埠，种出一片未来

◇ 杨丹建（口述） 金梦梅（整理）

人物名片：杨丹建，新洲区政协委员，武汉紫薇文旅集团副总经理，武汉紫薇生态农业公司总经理，紫薇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生态稻田项目负责人。

站在田埂上，看着田里的庄稼一天天长高，我常常会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只求一碗饱饭的农家少年。从泥土里来，回到泥土中去——这是我半辈子的人生轨迹。这条路，是二十多年的坚守，也是一场关于农业、家乡与未来的漫长探索。我想讲讲我的故事，一个关于守望与耕耘的真实经历。

唤醒一片田

2021年，我参与到紫薇国家级田园综合体项目中。那时的仓埠，和许多乡村一样，面临着传统农业的困境：种地不赚钱，年轻人纷纷外出，良田眼见着荒芜。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直琢磨着，怎样才能让土地重新焕发活力，让农民在家门口就有奔头？

要改变现状，光有热情不够，需要一场从观念到技术的彻底革新。我们决定用新理念、新技术为传统农业注入活力。当无人机在田里进行精量直播，当智能系统自动监

控湿度和病虫害时，老乡们又惊讶又好奇：“现在种地都这么高级了？”我告诉他们，时代变了，咱们种地也得变，不仅要产量，更要品质和效益。

改变的过程并不容易。最初推广“稻+鱼+虾+鸭”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时，很多村民直摇头，觉得这是瞎折腾。我和团队没有多说什么，干脆住到田边的板房里，手把手地教，在大半年时间里，几乎天天泡在田间地头。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这种模式实现了每亩综合增收50%以上。当初反对声最大的老乡，后来成了我们最积极的推广员。

我们还通过统一流转，将3000亩原本抛荒、分散的土地整合起来，建成了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基地。这一下，可耕作面积增加了550多亩，土地利用率提升了20%。这片土地如今成了我们的“试验田”，试种过42个水稻品种，其中不乏获得“江城优米”金奖的优良品种。2023年，我们打造的“武湖”鸭稻米一上市就反响热烈，供不应求。看到仓埠自己种出的米这么受欢迎，我和老乡们一样，心里满是自豪。

改变，就这样在田间地头悄然发生，影响了每一个人。

盘活一湾水

我始终认为农业不能是孤立的，必须与文旅结合起来，才能走得更远。我们仓埠有着丰富的水资源，但过去很多鱼塘、水坑都荒废了，看着让人心疼。

2023年，我们启动了武汉湿地樱花园项目，提出了“护水、活水、富水、乐水”的“四水”理念。印象最深的是止马墩水库，第一次去考察时，那里杂草丛生，大家都觉得这地方没救了。

但我们没有放弃，带着团队反复测量、规划，硬是把这片荒芜的水域，打造成了如今樱花漫舞的生态打卡地。在这里我们种了上万株珍稀樱花，花期能持续60天，还创新采用了生态浮岛技术培育水上樱林。

改造过程离不开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记得村里的段大爷，起初坚决不同意改造他家旁边的水坑，说那是祖上留下来的。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找他聊天，给他看设计图，讲建成后的样子。最终，他拉着我的手说：“我看你是真心为村里好，我信你！”现在，段大爷主动当起了樱花园的义务讲解员，见人说这是村里的宝贝。

除了樱花园，我们还对仓溪古河道进行了彻底整治。这里原是淤泥堆积的臭水沟，通过疏浚河道、加固堤防、提升景观，修建亲水平台和仿古栈道，如今成了集田园观光、休闲健身于一体的生态绿道，成了乡亲们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我们还举办开犁节、丰收节、稻田音乐会，开发露营、抓鱼、研学等体验项目，推动“农业+旅游+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三年来，各类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通过电商直播推广农产品，销售额超

过千万元，真正让一片田、一湾水、一树花，成了带动百姓致富的“活资源”。

点亮一束光

成为政协委员后，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思考得也更多了。尤其是看到村里的留守儿童，总会想起自己的童年，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023年冬天，我们发起“暖冬行动”，走访困难留守儿童家庭。看到孩子们在冬天连件厚棉衣都没有，我心里特别难受。当我们把过冬物资送到他们手中时，孩子们紧紧抱着新棉衣，眼里闪着泪花的样子，让我至今难忘。我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持续地为这些孩子做些实事。

第二年春天，我们开展了“书香润童心”活动，向周边小学捐赠了五千多册图书。在仓埠小学，有个小男孩怯生生地问我：“叔叔，这些书我们真的可以带回家看吗？”我摸着他的头说：“当然可以，这些都是送给你们的。”他立刻抱着一本书跑到角落，如饥似渴地读起来。那个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近三年来，我牵头组织了各类帮扶活动20多次，累计捐赠物资价值30多万元。对我而言，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笑脸和一份份真挚的感动。我还提交了《关于推进城乡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建议》提案，呼吁社会更多关注留守儿童。同时，推动企业与学校结对，开展“田园课堂”，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在劳动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有人问我，花这么多精力做这些值不值得。我的答案始终是：当你看到孩子们的笑容，看到老乡们生活改善后脸上的光彩，就觉得一切付出都无比值得。这条路，我会带着这份初心，一直走下去。

恰同学少年，“造梦”路上再“造脑”

◇ 邓彪

人物名片：邓彪，中科凡语联合创始人，湖北产业教授，湖北大学兼职教授。

当医生轻点鼠标，病历上的文字便自动转化为结构化的多语种诊疗记录；当大学生打开翻译平台，即时呈现的专业译文让课堂讨论变得顺畅——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背后，藏着中科凡语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勾勒的智能图景，为机器注入“思考”能力，为行业锻造“决策”智慧。这既是一场关于技术的“造梦”之旅，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造脑”工程。

“语”路前行，落子武汉

1996年，我考入湖北工学院（后改名湖北工业大学）学习。校园里梧桐树的绿叶、

巡司河的绿水、足球场的绿茵滋养着我，母校培养的一批又一批优秀校友，在各行各业建功立业，沉淀榜样的力量，无形中影响着我。

我读的是机械设计专业，除了专业技能，我积极参加各种校内外活动，这锻炼了我的文字能力、协调能力、管理能力。2000年，我从湖工大出发，带着校训“厚德博学、求实创新”，踏上了人生新征程。

小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当官”。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到省直机关工作了15年，官至正处。然后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构想：“创业”。

2018年，我在北京与人联合创办北京中科凡语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人工智能+”智能原生企业，致力于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研发，专注语义智能，服务类脑决策。

我们从北京中关村起步，一步一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人工智能领域隐形冠军企业。

无论走多远，内心最厚重的牵挂，永远是家乡湖北；无论走多久，内心最温暖的情结，始终是母校湖工大。湖北是我的根，武汉是我的家。这里有着千湖之省的灵山秀水，有着“光芯屏端网”的产业集群，有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近年来，湖北推出一系列招才引智优惠政策，特别是深入实施“校友回归”专项行动，让我们看到了家乡湖北蓬勃发展的耐心、信心和决心。

母校的情意，湖北的机遇，时时在招引我们。2021年6月，中科凡语华中区域总部正式落户武汉，向着建成武汉一流的“人工智能+”产业研发基地出发，重点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大语言模型、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落地。武汉的“965”产业布局里，人工智能是重中之重，而这正好与我们中科凡语聚焦的自然语言处理(NLP)赛道高度契合。可以说，这是一场城市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作为中部交通枢纽，武汉的高铁、航空网络如同伸展的臂膀，助力中科凡语将技术服务辐射至中部各省，更沿着“一带一路”的脉络触达全球市场。而武汉的科教人才优势为企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活水。在武汉，中科凡语与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共建的产学研平台，成为培育技术种子的温床，让NLP领域的创新人才扎根生长。



2020年11月，凡语AI研究院正式成立

使命共达，技术攻坚

中科凡语的研发团队，是一群追光的人。公司依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20余年的技术积淀，在顶尖科学家与产业专家的带领下，构建起“学术+实战”的双核架构。在这里，“师徒制”让新人快速成长，技术专家晋升通道点燃创新热情，每个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奔跑。

我记得有一次为某重点单位开发多语种数据分析系统，面对数据敏感、交付周期紧的难题，团队成员自发组成“尖刀班”。连续两周，办公室的灯光彻夜不熄，团队成员们像精密咬合的齿轮，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让处理效率提升80%提前完成任务。“技术攻坚，使命共达”，这八个字深深刻进每一个人的内心。

中科凡语“产学研”一体的完整链路，像一列高效运转的“直通车”，一头连着实验室的前沿理论，一头通向场景的实际应用。

在研发方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提



邓彪接受武汉广播电视台采访

供前沿理论“燃料”，中科凡语将其转化为技术应用“动能”，双方联合主办的“语言AI学术论坛”，成了技术迭代的“加速器”。在人才方面，中科凡语与百余所高校共建的“新文科数字人文创新实验室”“多语种翻译与语料库建设实训基地”等平台，是培育复合型人才“摇篮”。“凡语AI研究院”像一块磁石，吸引着顶尖专家加入。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中科凡语装上了发展的“助推器”。多年来，中科凡语研发“信译”“信推”“信析”“信服”和“信取”五大NLP技术产品，并推出三大平台。

飞译——CAT（应用监控）平台。将原本面向企业端的翻译学习方案和辅助翻译技术通过平台化的方式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可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不同需求，实现80多种语言的互译互通以及30多个语种的图像翻译，真正做到语言无国界，信息可理解。

洞知——全网态势感知平台。围绕认知决策所需的“感知—理解—推理—决策”路径，

面向各种语言、各种场景、各种用户、各种应用等，运用系统化、模块化、工具化设计，以组件定制的形式来整合模块功能以对外输出解决方案。

数云智脑——混合智能系统。以社会计算和机器智能的深度融合为目标，通过建立符号、模式、场景等相互连接通道，形成兼具人类智能体的感知、记忆、推理、学习能力和机器智能体信息整合、搜索、计算能力的新型智能系统，实现态势的灵敏感知、趋势的精准研判和高效的决策洞察。技术变革点亮美好生活，NLP将带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

逐梦全球，“智”造未来

现在很多人聊AI，喜欢说它如何“生成千万种可能”。但在很多严肃场景里，比如政府公文、企业产品管理，需要的不是天马行空的创意，而是精准、统一的“标准答



中科凡语研发团队测试“智策大模型”

案”。这看似简单，却是 AI 最难突破的“认知鸿沟”。

正是对“标准答案”的执着，让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2025 年年初，一家国外的世界 500 强公司有数万件产品需要实现在线智能客服服务。由于产品特性参数复杂、技术文档格式多样而难解析，该公司辗转考察多个技术团队，最终找到中科凡语。

对方起初对模型精度和响应效率有疑虑，毕竟这项任务过于复杂，有难度。然而，三周内，中科凡语就给出了解决方案。对方感叹，没想到武汉 AI 团队能把技术与场景适配做得这么好，效率这么高。

在教育领域，中科凡语将传统语言教学提升为复合型人才教育。语言的使用必然是在一定的场景。不同国家语言的背后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同一种语言、不同行业同样有其专业知识壁垒，用数据和算法搭建起不同的场景，把语言变成工具，更有利于培养出专业场景中的复合型人才。

在医疗领域，中科凡语为某生物制药公司和医疗机构推进医疗 AI，在电子病历结构化处理、医疗文本分析、智能辅助诊疗和智能分诊问诊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提升协同效率。

垂直模型是未来必然趋势，每个企业都需要自己的 AI 大脑。2021 年至今，中科凡语垂直模型业务快速增长，技术出海销售额占公司总收入的三成以上。

总有人问我，AI 发展这么快，会不会取代人？我的体会是，AI 在存储、计算、记忆方面确实强大，但人脑那种举一反三、洞察本质的联想能力，是目前机器难以比拟



中科凡语荣誉墙

的。AI 更像是一个“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它把我们人类从简单、重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能更专注于那些需要创造力、洞察力和情感联结的工作。

就像汽车取代了马车，但创造了司机这个新职业；就像智能翻译工具越来越强，反而能让外语学习者跳出机械的语言转换，去更深入地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让语言真正回归“工具”的本质。

这条路，我们还在继续探索。这条路，从来不止于“造梦”，更是为千行百业“造脑”。让病历会说话，让文档能思考，让翻译有温度，让系统懂决策……当语言 AI 如水电般融入生活，技术便不再是冰冷的代码，而成为赋能于人、弥合鸿沟的温暖力量。这就是我们中科凡语的故事，也是一群中国科创人，正在亲手描绘的明天。

江汉关博物馆建设纪略（上）

◇ 李笙清 彭 建

2012年12月，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统筹安排下，武汉海关从江汉关大楼迁往金银湖畔。这座承载着众多武汉人记忆的大楼迎来一次重大转折，辟为反映武汉城市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江汉关博物馆。

从2010年至2015年，江汉关博物馆经历了立项、筹建、正式开馆等多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凝结了有关部门的聪明才智和建设者的心血汗水。

依托老海关大楼建馆

江汉关大楼建成于1924年，是武汉近现代历史上的地标之一，国家级文保单位。

2010年，为展现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推进武汉历史风貌街区保护工作，武

汉提出“依托江汉关建设博物馆”。

在武汉重视文化发展繁荣、强力推进“文化五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建设江汉关博物馆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是依托江汉关建设博物馆，有利于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留住武汉的城市记忆，使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添魅力。二是新建江汉关博物馆，将是全国唯一一家由地方政府投资主办、依托老海关建馆的专题性博物馆，不仅体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也将推动全国海关博物馆的建设。三是建设江汉关博物馆，将为武汉“博物馆之城”建设发挥示范作用。

2010年3月11日，武汉市政府召开专题咨询会，邀请武汉地区知名历史、文物、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章开沅、冯天



专班，并从武汉博物馆、辛亥革命博物馆、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等文博单位，抽调专人成立江汉关博物馆筹建处（办公室设在武汉博物馆内），由原武汉博物馆党委书记向元芬研究员牵头，开展陈列文案编撰、文物征集等相关工作。2012

年12月，原武汉海关整体搬迁后，又抽调武汉詹天佑故居博物馆馆长刘国斌研究员主持大楼维修项目。

瑜等认为，江汉关大楼是不可多得的国家重点文保单位，是我国近代海关代表性建筑，是武汉近代化的象征，一致提议将馆名确定为“江汉关博物馆”，展示内容以汉口开埠通商为切入点，展示武汉由传统内陆商埠向近代工商业城市转型的发展历程，以及一度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都市的过往。

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武汉海关的大力支持下，市发改委、财政局、房产局、风貌办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筹建工作稳步推进。市政府副秘书长唐惠虎多次就方案论证、文物征集、大楼维修等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组织研究和协调。

基本陈列奔赴南北取经

受江汉关大楼总建筑面积（4109平方米）和内部布局所限，专家一致建议，将江汉关博物馆定性为专题性博物馆，展览主题突出展示武汉近代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时兼顾列强对武汉殖民侵略设立租界的屈辱历史。专家学者认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汉口已成为我国第二大经济实体，对外经济贸易量在长达37年时间里仅次于上海；近代工业的许多产业，武汉也在全国开风气之先，展示陈列应充分反映这一时期的辉煌。

基本陈列初步大纲定名为《艰难的跋涉——武汉城市近代化历程》，划分为四个单元，分别是“开埠设关——城市发展和文明转型的开端”“汉口租界——‘西方文明’的特色城区”“工商经贸——‘东方芝加哥’的崛起”“生活变迁——开放趋新的社会风景”。第一单元围绕汉口开埠江汉关设立展开，讲述中国近代海关历史及江汉关业务职能；第二单元主要展示汉口租界的设立、管理与金融、社团、娱乐及发生在租界内的重要政治事件；第三单元展示武汉尤其是汉口

2011年1月和7月，武汉市政府又两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和部门协调会，并责成市文化局承担江汉关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市文化局迅速成立以局长和晓曦为组长、副巡视员何永乐具体负责的筹建工作



走访甘胜禄、崔祖元（左图中）、薛友平（右图）等海关老人

近代工商业及对外贸易的情况；第四单元反映武汉近代市政、交通、文体、社会风俗的多元化。

2011年1月10日，江汉关博物馆第一次陈列大纲专家讨论会在武汉博物馆召开，邀请冯天瑜、皮明庥、徐明庭、萧志华、涂文学、王汗吾、刘庆平、赵晓琳、杨义云等历史、文博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大家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补充意见，对一些史实进行勘正。

经过充分咨询，基本陈列以文物为基础，综合运用照片、图版、表格、油画、场景复原、电子翻书、触摸屏、多媒体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充分展示武汉在开埠通商后的迅速崛起及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其构想是：第一个层面用建筑本身来表现，即通过恢复建筑原貌和再现历史场景，形象反映江汉关百年历史。第二个层面用展陈来表现，即江汉关所关联、辐射的汉口开埠、租界开辟、近代工商经贸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迁。为更好地展示近代海关的本来面目，确定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对原江汉关报关大厅、税务司室、江务科、秘书科办公室及钟楼的内外场景、设施进行复原。

综合专家学者意见，大纲制作组开始对基本陈列大纲进行大刀阔斧的修订。囿于江汉关复原资料的匮乏，筹建处根据线索，多次走访民国时期在江汉关工作的甘胜禄、崔祖元老人，还前往番禺、南京，找到曾在江汉关工作的叶自任、薛友平老人，在获得一些相关信息资料的同时，还获得他们捐赠的部分实物，丰富了基本陈列。

为进一步完善展陈文案，筹建专班组织考察团队，先后赴深圳、广州、上海、天津、沈阳等地学习考察，打开展陈思路，拓展文物征集线索，也学习海关老建筑维修及依托老建筑办展的经验。

2011年8月26日—9月2日，考察团队到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区）、中国海关博物馆广州分馆（粤海关大钟楼内）、孙中山先生故居（原粤海关黄埔分关）、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深圳海关博物馆、深圳博物馆、香港海关展览馆等处考察学习，与博物馆同行交流，采访海关人士，切磋展陈设计理念，搜集实物、照片等相关资料，受益匪浅，为拓展和丰富展陈文案提供了基础。

一是资料收集。江汉关基本上只剩一

幢旧址大楼，要做好报关大厅、税务司室等办公场所的复原陈列，海关文物、实物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展品。考察团队在广州海关博物馆，重点学习其依托旧址布局展陈的设计理念，借鉴展示内容及手段，并与张冬梅副馆长交流，为完善展陈方案及下一步收集资料、复制文物找到了方向。

二是展陈借鉴。广州海关博物馆在粤海关大楼旧址上“整旧如旧”，将粤海关办公、报关等场景按原样复原，辅之以海关文物、实物复制品、历史图片等，以幻影成像的形式反映海关稽查过程，使展览显得更加生动。而且，延伸出粤海关之外的中国近代海关背景，内容更加丰富。香港海关展览馆展厅布局精致，在有限的空间以弧形展线划分5个展域，展示各种受管制物品、冒牌货品、侵权物品、濒危物种、吸毒工具及不同年代的海关制服及装备，同时在小型影院播放短片介绍海关历史，一目了然。

三是采访收获。在启程考察之前，考察团队通过多方查找，与深圳海关政治处的吴煮冰先生取得联系，重点进行采访。吴煮冰曾在武汉海关工作一段时间，著有《江汉关史话》，参与编撰《中国海关通志》，对中

国海关历史颇有研究。吴煮冰提供《江汉关史话》所用的部分历史照片，在基本陈列后期制作中得以使用。通过吴煮冰，还获知江汉关一些实物的去向，如一块江汉关石碑在武汉海关院内、部分桌椅在湖北省外经贸厅幼儿园见过。此外，吴煮冰还就资料收集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如吸收武汉海关人员参与专班，便于在联系、协调海关档案馆查找资料时提高效率。他还告知中国海关总署有一个准备十年之久的中国海关史陈列，调动了全国各地海关文物资源，建议我们及时与之联系，可借用一些海关文物。

文物征集收获“镇馆之宝”

筹建专班制作基本陈列大纲时，面对文物、资料的严重匮乏，深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因而紧锣密鼓同步展开文物征集工作。

一是成立文物征集小组，确定征集方向。为保证文物征集工作的效率和规范，制定《江汉关博物馆文物征集管理实施办法》，对文物征集的范围、种类、程序、方式、认定、管理及专家评审机制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征集范围为：与江汉关有关的实物、资料，如办公桌椅、关服、老商标、明信片、徽章、信札、谕旨、函件、证件、关旗，邮政、气象以及生活用品等；与武汉城市近代化发展相关的实物、资料，包括政治、军事、商贸、教育、卫生、市政建设、群众娱乐等。

二是成立文物鉴定小组，确保文物质量。相继邀请万全文、刘庆平、万建新、王更胜、王瑞华、刘昕、赵晓琳等省市文物、文博



考察广州海关博物馆粤海关复原陈列



江汉关博物馆文物鉴定会和文物、资料捐赠仪式

界知名专家，成立专家鉴定小组。根据征集实物的具体情况，还邀请张少山、曹红光、董柏华、梁华平、周斌、李智刚、刘犇、沈杰、陈燕飞、尹明祥、桂祥盛、刘新阳等省市专家，对相应的征集实物进行鉴定，确保征集效率。筹建专班先后召开7次文物鉴定会，征集到“大清邮政分局”牌匾、江汉关银锭等相关文物、资料数千件（套），保障了基本陈列的需要。

三是由市政府协调，拓宽征集渠道。2012年11月22日，市政府办公厅召开江汉关文物征集协调会，邀请武汉航道局、邮政局、气象局、卫生局及长江航务局、长江海事局、长江航道局、检验检疫局、港务集团、江汉区政府等与近代海关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参加，进一步征集相关实物和档案资料。

四是开展媒体合作，多方发布文物征集信息。建立与新闻媒体、文物市场、网购平台及民间收藏家等多层面的联系，在《中国文物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报纸及网络发布文物征集启事，并与《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合作，分别推出“寻访江汉关记忆”“寻找江汉关记忆”专栏，社会反响热烈，收到良好效果。广大市民踊跃捐献

相关文物、资料，收到老海关关服、新旧两任关长签名的贺喜绸缎等数百件。堪称“镇馆之宝”的江汉关银锭，就是藏家主动联系筹建专班，达成两枚文物顺利入藏。与此同时，还利用网络平台寻找文物线索，征集到一批直接相关的文物，如一套民国时期江汉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明，就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信息，从而买下顺利入藏。

五是多方打开文物征集渠道，主动上门征集。数年来，文物征集小组除了跑遍武汉三镇收藏品市场外，还根据民间收藏家提供的信息，前往上海、北京、宁波等地征集文物，尤其是两度到宁波一位藏家家中，征集到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数十件相关实物，其中大多在基本陈列中展出。

李笙清、彭建，武汉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法文游记中的晚清武汉“水上城市”

◇ 吴 敏

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是控扼中国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汉水支流纵横，物产丰饶；长江更是连通下游富庶省份和上游天府之国，可资提供充足的商品货源。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武汉吸引着汉水、长江沿线商贾前来贸易过往，泊于此的货船不计其数。由此，在两江江面之上，形成了一座奇特的“水上城市”。

中国各地船只的展场

汉口开埠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游历至此，记叙了长江岸边的泊船奇观：“在长江8公里的江面上，通常停泊着大量的帆船，以至于从江对岸，即从汉阳和汉口望去，就像是一大片森林；而近看则是一座漂浮在江面上的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这个船上聚居区甚至延伸至16公里之外，不过不再如上述停泊地那么拥挤。整体上形成了一片绵

延24公里的港埠，停泊着不计其数的船只，此景象若不是亲眼所见，简直无法想象。”

法商欧仁·皮少耐则在游记中记载了汉水江面的泊船盛况：“因为长江水流湍急，帆船都停泊在汉水上，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一艘挨一艘地排列在岸边。在宽200米、长不下6公里的水域内，大约有一万多艘不同省份的各式船只。”

法国外交官白藻泰称汉水船只紧密排列，“在超过十英里的水面上几乎粘连在一起”。他在汉口华界码头登上一艘帆船，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驶出汉水，进入长江。他写道：“低矮的、高大的、凸圆的、细长的、撑帆的或收帆的、双桅的或单桅的中国船只，形成了一座漂浮的城市，形态各异，充满活力，穿过这些横七竖八的船只，很难躲开桨的碰撞，也很难用包铁的竹篙开辟通道。”

法国记者乔治·魏勒斯同样也有在江面



汉水出口（选自 弗朗索瓦·加多弗尔《汉口三镇》）

奋力开辟通道的经历：“我们到了汉水出口时几乎看不到出口，因为出口被密密麻麻的船只堵塞得严严实实，就像当年漂浮植物形成的大片阻塞一度让斯坦利看不到刚果河的几条主要支流的汇合处那样。”这里说的是英国探险家莫顿·斯坦利从刚果河源头卢阿拉巴河行进至刚果河的出海口，首创历史记录的事迹。

古伯察神父从汉阳渡江到武昌，在武昌码头同样遭遇了“堵船”：“经过三刻钟的航行，我们平安抵达武昌府的一个码头，在那里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在停泊的横七竖八的船只中穿行。”

武汉“水上城市”桅杆如林，帆影蔽日，各个码头上人声鼎沸，货流不息。福州船政局教师莱昂·卢塞在游记中留下了关于汉水码头商业活动的记录：“船上和船间一派繁忙：有的船抵达，有的船离开；小舟穿梭于其间；装卸货箱和货包的船夫在单调却富有节奏的歌声中劳作；掮客和商人来来往往；岸上脚夫挤来挤去，给了汉口这片街区充满生活气息和商业活力的独特面貌。在你眼前展开的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场景，你可以看到中国人非凡的贸易才能渗透到了最小的细

节！我们不厌其烦地欣赏着船夫们的敏捷身手，他们成功地在此种混乱中驾驶他们的大船或小船而不会撞到一起。”

两江江面船只的拥挤场面，是汉口贸易繁盛的最好证明，而来自各地的不同类型的船只，则显示出汉口商业强大的辐射力。法国人发现两江沿岸，就是一处中国各地船只的展场。

法商欧仁·皮少耐饶有兴致地描述所见的船只：“广东和福

建五颜六色的大船，挂着席帆；旁边是江南和山东过来的大船，颜色没有那么显眼，挂的是白布帆或棕布帆。这些船都保留了诺亚方舟的形状，船头有一对大眼，好像没有眼睛航行时就搞不清楚方向一样。接着是湖北船，小而精致，帆布雪白；四川船的船头圆润细长；河南船船身狭窄，速度很快。”

船上人家的日常生活

在当时，船只不仅是运输工具，也是船上人家的生活空间。由于常年在外，船老大通常携家带口以船为家，在船上设置简易的生活设施。这种生活方式既节省了陆地居住的成本，也便于随时应对货运需求。船老大负责指挥行船，妻子承担日常起居，孩子从小学习航行技能，形成了独特的水上生活方式。除了运输货物，这些船只也会捎带乘客，沿长江西行或溯汉水北上，以增加收入。法国传教士莫伯理在汉口乘船入川前往贵州，记录了船上人家的日常生活：

我的船在船尾有一个船舱，船老大和他的妻子、七岁的小女和岳母住在那里：她们三人都是小脚，也就是说，她们的腿像棍

子一样杵在地上。她们整天都在脚炉旁边取暖，把一个共用的大烟斗递来递去，或是透过船舱的门缝看我们，因为她们是不会出来的。由于年龄的原因，只有小女孩能够进进出出，她趁此机会在我们的船舱里瞟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这对她来说是很有趣的事情。船老大的船舱的宽度跟船的宽度一样，长度则有大约5法尺，前面是一个4米长的“院子”，靠水两侧有木板护栏，以一个竹篾顶棚覆盖于上：晚上，它们非常紧密地把“院子”封闭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房间。可以看到一个炉子，这是我们的厨房，悬挂着腊肉和其他的肉类，还有一些咸鱼，以及装满土豆、萝卜和洋葱的篮子：这些就是我们的食物。两卷用竹席包裹起来的被子，这是基督徒驿夫的床，他们负责看管船上的货物并为我们做饭。“院子”白天是他们的起居室和厨房，晚上是他们的卧室。那边还有船舵，因此也有舵手，他不断地向船员喊出一连串中文骂人的话，吵吵嚷嚷的，尤其是有一个意思是“姐夫”的词！不知所云！

在小“院子”之后，是我们的客舱，和船一样宽，3米长；一扇门通向厨房，另一扇门通向甲板；里面一边有两张床，另一边有一张床，这是我的床。我的床尾那边是吃饭的地方，放着一张小方桌和三把凳子。我们的床就是在支架上搭一块木板，铺上一张草垫和两床被子。我们的行李箱塞在床下。小桌子被我们每天早上用来做弥撒。甲板上方覆盖着竹编的船篷，早上卷起来；晚上展开作为船员的住处。他们有14个人：1人把舵，2人总是在船头操纵，其他11人有时在船上忙着划动两支非常重的大桨，有时在岸上拉拽一根固定在大桅杆顶部的长纤绳，使我们能够逆流行驶。我们的船有两根

桅杆，各挂一张帆。在大桅杆脚下是船员的厨房，放着一个炉子和一口大锅，里面总是煮同样的“食物”——米饭，总是配以同样的“调料”——水。需要拉纤时，船侧的小舟就会把船员送上岸；需要划船时，就把他们运回船。

长江水流湍急，天气多变，航行充满危险。船上人家敬畏自然，渴望平安，会通过祭拜河神、烧香祈福等方式，祈求次日航行顺利。来自法国的全少章神父记叙道：“晚饭后，夜幕降临，我第一次见识了船上的迷信仪式。船老大捧着一个托盘向前走，表情严肃，托盘上有一大块猪肉，还有大米、茶叶和食盐。他把托盘放在船头，与此同时船上的一名男子开始敲锣，发出令人可怕的回响（这种乐器最初会给人一种惊惧的奇怪感觉）。船夫中最年轻的小伙子在船头四处走动，焚烧符纸，有点像我们天主教教堂祭坛上奉香的司铎，然后他炸响了十几个绑成一挂的鞭炮。每天晚上中国船夫都会向鬼神祈求第二天能有一个好天气。”

对于常年行船于险风恶浪之中的船上人家而言，这样的仪式不仅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也增强了航行的信心与勇气。

骇人听闻的船上火灾

人们在船上起居、劳作，使这座“水上城市”成为了一片庞大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社区，充满生气和活力。然而，无论是船只易燃的木质结构还是烹饪、照明等明火设施，都构成了火灾爆发的重大隐患。法国记者爱德蒙·柯多记载道，汉江之上，船只靠泊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当桥来用，从岸这边走到岸那边”。船只和人口如此密集的聚集，若遇火灾，几无逃生通道可言。而靠泊



汉口俯瞰（选自莱昂·卢塞《穿越中国》）

于长江岸边的船只为了抵御风浪，通常会系连在一起，更是将自身置于极度危险之中。清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1848年12月14日）夜，武昌塘角码头因水手吸食鸦片不慎失火，一日一夜烧毁船只千余只，人员死伤无数。古伯察神父记载了这次骇人听闻的火灾：

1839年1月1日晚上，狂风席卷了成群的船只，混乱中有一艘船着火。火趁风威，加之许多船装载的焦油和易燃材料的助燃，火势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延至附近的船上。在大火和狂风的作用下，缆绳断裂，着火的船只被风吹散，仿佛要到处去摧毁它们接触到的一切。眨眼工夫，船只带着吞噬它们的火焰横冲直撞。在火场中，人们在绝望中备受折磨，被狂风撕裂，被大火追赶，被怒涛包围，在肆虐他们的旋风中或是在吞没他们的江流中挣扎、尖叫和死亡。目击者证实，在24公里的范围内，长江就像是火的海洋，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所有这些船只被烧毁，船上的穷人都悲惨地死去。根据最保守的估算，这些船只的数量有三万多艘。在中国人的船上，即使是最小的船，除了船夫之外，船老大全家人通常都住在船上，在船上

出生、生活和死去，他们居无定所，不知从何而来。另一方面，据称有一些大船被烧毁，有的船载有四十人、五十人甚至六十人之多。然而，无论这些数字的平均值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遇难者的人数是惊人的。据说，从江里捞出来的尸体数量为七万具，因火烧而面容被毁和肢体残缺。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船满载货物，

属于来自各省的中国人。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这场可怕的火灾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全面破坏，它可能是我们在中国甚至是在世界范围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场火灾。

古伯察神父关于这次重大火灾的记录是听本地人口述而来，火灾发生时间记载有误，但给我们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虽然具体情形和死难数字不可尽信，但造成的重大损失却是事实。

此次重大火灾，折射出地方政府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方面的失能。封建主义体制下，地方政府以统治为中心，偏重秩序的维护和赋税的征收，缺乏公共事务治理意识，流动性极强的“水上城市”更是被置于极其边缘的位置。虽有士绅和商人自发创立的民间消防组织，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导致训练不足、资源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消防体系应对重大灾情。这样一来，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水上，人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就会时常处于危险之中。

吴敏，汉口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老武汉年俗童谣：过年

◇ 彭翔华

吃年夜饭

过年是个过程，由诸多元素构成，细节一省略，步骤一简化，年味就淡散了。如到餐馆吃年夜饭，如同走过场做任务一般，少了自家准备年夜饭的辛苦，也就少了许多滋味。

过年是美食的集结号，团年夜饭更是最重要、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盛，新一年的日子就盛。为了这顿饭，即便在生活条件最为困难的年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倾其所有。其他可以省一点，年夜饭不能将就，这是根植于骨子里的民俗意识。

吃年夜饭有许多讲究，盘盆碗碟，必须成双，双数为吉。每样菜肴上面还要放点装饰，

最常见的是胡萝卜雕花。中间放大盆汤，这叫“聚宝盆”。有三圆（肉圆子、鱼圆子、糯米或豆腐圆子），象征“三元及第，圆圆满满”。有只能看不能吃的全鱼（听话鱼），唤作“年年有余”。有豆腐，谐音“都富”。有芹菜，寓意“勤快”。还有用千张丝、粉丝、红白萝卜丝、藕丝、黄花、木耳、香菇、芹菜等一起炒成的“什样菜”，表示“福禄寿喜、十美十全”。碗中要剩饭，此为“碗不露空，有吃有剩”。总之，名堂很多，也很有趣。

吃年夜饭有些不成文的禁忌。不能淘汤，否则以后出门就会碰到落雨。有道菜叫笋子炒肉，味道鲜美，平时无所谓，年夜饭不能上，笋子者，审子、损子也，于子女不利。不能抢吃，不能翻菜，不能敲碗，不能说些

不合时宜的话，特别不能掉筷子。有种老说法，伢们吃饭掉筷子，预示要挨打，如果吃年夜饭掉了筷子，呵呵，伢呀伢，你这一年怕是有挨不完的打。吃年夜饭须关门闭户，忌人打扰，尤其不喜上门乞讨或借东借西。

年夜饭席结束之前，大人要给伢们赏封，俗呼压岁钱。《中国歌谣集成·湖北卷》605页，有一首向人红1952年采录于武昌的童谣：“天竹腊梅配水仙，起火炮儿百子鞭，侍候姑爷来拜年，大红钞袋压岁钱，五子登科万万年。”

“岁”与“祟”谐音，压岁即压祟。钱是有魔力的，可以压住邪祟，最好是没有用过的新钱，新崭崭的硬挺有光泽，还须用红纸包好，财不外泄。现在给压岁钱，虽可微信转账，但人们还是喜欢用红包装现钱，因为那种特有的仪式感，确是一种美妙享受。

守岁

年夜饭毕，接着要开门放鞭，鞭越大越长越响越吉利。各地风俗不一，吃年夜饭的时间有早有晚，武汉坊间定在大年三十晚上的较多，吃年夜饭带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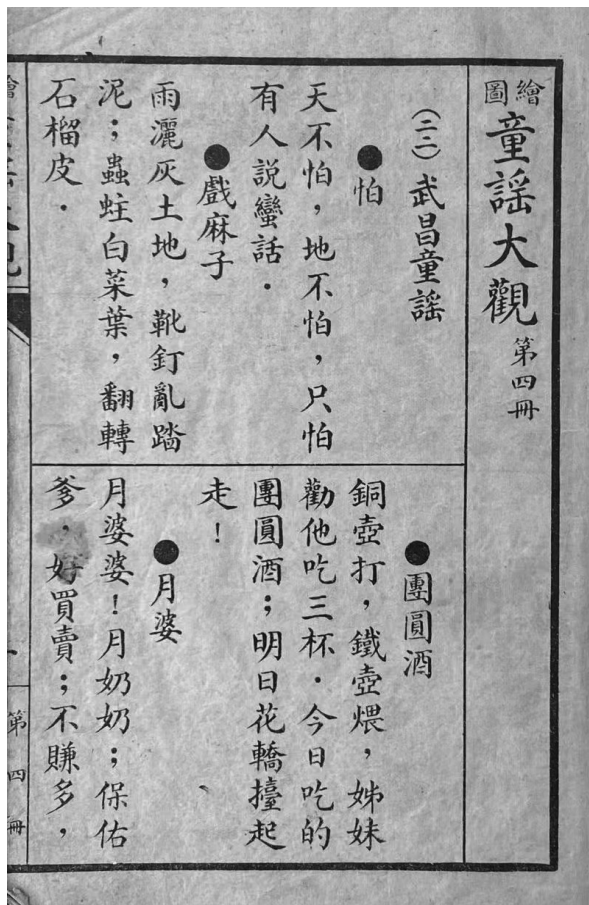
三十守夜也叫守岁，缘何要彻夜不眠，说法很多。一说这最后一夜每个人的魂灵都要去庙里“参庙点卯”，如果这个人睡着了，他的灵魂参完庙点完卯后，有可能找不到真身，为避免尴尬发生，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睡。



团团圆圆吃年夜饭

一家一户守夜的场面是温馨的。老少人等围坐在烧着板炭（亦叫桴炭）的火盆旁，喝香片、嗑瓜子、吃花生、烧糍粑、炕年糕、谈家常、讲故事、说笑话、忆往昔、说未来，其情也畅，其乐也融。有童谣描绘守夜迎新的情景：“板炭烧得红通了，糍粑烤得黄霜了，瓜子嗑得脆蹦了，茶叶泡得香醇了，米泡冲得甜咪了，一家老少乐呵了。天亮了，鞭炸了，江汉关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年来到了，从头到脚新崭了！”其中的“红通了、黄霜了、脆蹦了、香醇了、甜咪了、乐呵了、新崭了”，都是极具武汉方言特色的形容词。

实在熬不住瞌睡的，当然只好上床睡觉，“俗呼除夕寝为挖窖（gào）”，挖窖，挖金掘银，这不是做梦吗？《汉口竹枝词·卷二·时令》有曰：“黑甜一枕养精神，除夕酣眠味更醇。莫怪俗人呼挖窖，发财须是梦中人”。叶调元久居汉口，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挖窖之说是深得其味的。挖窖是过年期间的专用词，体现了武汉人对生活的一种另类幽默。



1922年上海世界书局《童谣大观（绘图本）》所载“武昌童谣”

守岁彻夜不能断香，家中要有亮灯，要燃鞭放炮，传说“年”是一种怪兽，每逢新旧之交会出来吃人，只有灯火亮光、炮竹声响才能阻挡它。

拜年

拜年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有同辈间相互拱手祝拜的，也有卑幼者向长辈叩头称颂的，长辈则要回送红包。

各家各户，开门关门，谓之“开财门，关财门”，客人上门拜年敲门，先要高喊“开财门啰！”。拙作《武汉歌谣故事》《武汉民间童谣辑注》载有童谣：“财门，财门，

打开，打开；拜年，拜年，拿钱，拿钱；恭喜，恭喜，发财，发财！”“拜年拜年，髻膝头（膝盖；髻，读如 ké）朝前；屁股一翘，又是一年。拜年拜年，双手朝前，不要你的枯黄豆，只要你的压岁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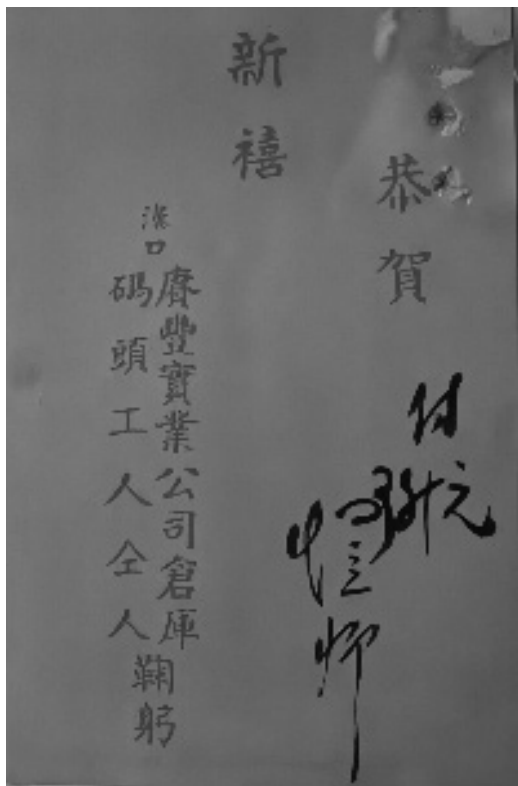
人们相互祝福，笑容满面，“拣初一的话说”，用尽甜言蜜语，说得最多的是“恭喜发财”。此外，武汉人还喜欢这样说：“恭喜你驾老的们越老越仙健，小伢们狗头狗脑！”

仙健：仙者，长寿；健者，身体康健。对老人家来讲，发财，升官不是那么重要了，仙健之类的祝福就顶了天。

这伢们“狗头狗脑”，不大好理解。与狗有关的多半不是好词，如狼心狗肺、狗头军师等，但这个“狗头狗脑”例外，它实际是“虎头虎脑”的意思，是祝福语。民间向有“从卑说”之俗，不能随便晒娃，把小伢说得太好，容易引起天妒反遭祸灾，从卑从贱才是妙招。婴幼儿的虎头鞋，叫作猫猫鞋，明明是虎，偏偏叫猫。小毛毛满周岁，人们会在猫猫鞋后面加个尾巴，“你的伢今天长尾巴了，恭喜恭喜！”不了解老武汉这个风俗，就听不懂这句话，人长尾巴，那还得了！

曹禺先生话剧《北京人》第一幕有句台词：“小柱儿，保佑你日后狗头狗脑的，长命百岁！”我打听了一下，北京人好像没有“狗头狗脑”这一说。曹禺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潜江，可能曹家仍然保留有老家的潜江话，因此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狗头狗脑”写进剧本。

旧时拜年主要靠两条腿走路，女人丁丁小脚，走不了多少路，更不用说到处跑了，家中的半大伢（cào）子伢往往是主力，他们机灵，活泛，门路熟，跑得快。到了



民国时期粉红色贺年片，上有华煜卿（解放后任湖北省副省长）字迹 葛亮 收藏

1960年代前后，骑个“二八载重（自行车）”拜年，那威风不亚于现在开宝马。

时间要赶早，过午不拜年。程序上，讲究长幼、辈分、亲疏，依次为父族、母族、妻族，最后才是一般亲朋好友。如果三亲六眷多，每家待的时间就很有限了，往往打个照面，说几句问候语，象征性地吃点东西，旋即告辞赶往下一站，主家一般不会执意挽留，武汉人把这个叫作“拜跑年”。

“初一早，年拜了，腰一弯，手一躃（tuǒ，向下垂），糖果饼子拿得我，我不要，往我荷包（衣兜）里倒；我不接，往我荷包里塞。”选自拙作《武汉民间童谣辑注》第112页，说的是拜年客不论大小，都会受到热情招待，有的伢们想早点完成任务，当主家叫他吃点心喝汤时，就赶忙说：“存倒、存倒，我下回再来吃！”好吃好喝，平时难

得，今天没时间吃，就跟我存着。伢们聪明，几会说话。

桂琴甫手写稿《新洲县古今民间歌谣》第169页选录：“拜年拜年，糍粑上前；板凳坐坐，瓜子嗑嗑；多拜多拜，多吃两块。”空手拜年，被人视为不敬不吉，即便再穷再难，手上也要拎上两个包。所谓的包，一般为糖果点心，如酥糖、京果、杂糖、红糖、麻烘糕等，用纸包好，扎以彩线。这都是好东西，自家舍不得吃，别人送来了，有时还要再拿出去送给另一家，提来送去，像击鼓传花。现在拜年兴送烟送酒，过去条件差，一般很少有。

人们还把幸福的希望投向神灵。武汉民俗极重正月初五拜财神，据说这一天是财神爷巡游民间送福送财的日子，机会要把握。是时，每年前来归元寺给财神爷上香祭拜的市民高达数十万，有人为了抢头香，彻夜等候。

彭翔华，湖北省非遗项目“武汉童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学高级教师，曾任葛洲坝三中校长、明珠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

黄陂清代榜眼刘彬士的题匾与墓碑

◇ 裴高才 杜春华

刘彬士（1770—1838），清代文榜眼，字辅文，号筱圃、筠圃，世居湖北汉阳府黄



刘彬士画像 项祎作

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刘家山、小刘湾与刘家大屋，魂归甘露山麓。生平跨越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科举试监试官、十五道监察御史、掌印给事中、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尚书及浙江巡抚等职。

“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笔者在撰述《监察御史传》期间，反复琢磨刘彬士撰题的匾额及墓碑，并结合清宫档案、方志史料与民俗文化，解读他鲜为人知的行谊。

“萱燦花甲”报母恩

在黄陂老家发现的一块刘彬士为其母六十大寿所题的“萱燦花甲”匾额，体现了他坚守“五伦八德”传统、孝敬慈母的人伦之道。古时人们通常将萱草种植在祖屋北堂



母亲的居室，因而“萱”或“萱堂”代称母亲；“燦”有鲜明、光耀之意。他用“萱燦”二字形容老母仁慈善良的崇高美德。旧时人均寿命不高，六十往往是难得的“花甲子”高寿，他四字联用又有“仁者寿”之意。

“萱燦花甲”匾历经百年沧桑，主题词与款识十分清晰。上款标明刘彬士的官方身份：“钦命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备兼理粮饷加三级刘彬士拜题。”下款为立匾的缘由与时间：“大懿德凤母陈太夫人荣进花甲，道光七年（1827）岁次丁亥仲冬月穀旦立。”

下款中的“凤母”，又称凤凰老母或九天玄女，是中国神话中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神仙，表明刘彬士视老母为神仙下凡。尾款的“刘彬士印”与“筠圃”两方篆书印章的笔划轮廓十分清晰，正好与湖北、湖南等地发现的匾额相互印证。

湖南邵阳一位藏家收藏了刘彬士为陈母蒋氏 71 岁所题寿匾“淑德遐龄”，其上下款位置与“萱燦花甲”匾一致。上款为“钦命大理寺少卿、提督湖南学政加一级刘彬士题”，下款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仲秋月穀旦立，母蒋孺人七十晋一寿，庠生陈学礼敬立”。极有可能是刘彬士任湖南学政时，作为陈学礼的座师，特题赠后学勉励其敬母。

此外，在湖南郴州桂阳县阳山古村何裕本故居，也保存着刘彬士题写的“声振骠骑”匾，赠给地方治安功臣何裕本。“骠骑”二字，取自司马迁

著《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因少年何裕本在平定地方匪乱中立了头功，道光皇帝钦赐九品军功。刘彬士奉命题写此匾，褒奖其见义勇为、保家卫国的义举。

“双寿同珍”贺同年

不久前，笔者仔细观赏了黄陂八旬老翁黎世炎收藏的刘彬士所题“双寿同珍”寿匾。这块长 2.5 米、宽 0.96 米、厚 0.04 米的横式木匾之所以保存完好，是因其材质为珍贵的楠木。匾的正面除几排突起的文字，平如镜面，装饰十分考究，以漆包金缠枝暗花图案为底色，符合清代中期风格。虽遭风蚀一两百年，花纹图案仍清晰可见，暗黄金色亦熠熠生辉。再看背面，方知此匾由四块楠木拼制而成。

匾上文字是一块匾的主题与灵魂，由款识和正文组成，其中款识的前后（或上下）部分，又依据题款者和受匾者的身份不同而格式迥异。一般而论，优秀匾文往往引经据典，字字珠玑，多凝聚中华人文要义。

刘彬士用四个高 0.7 米、宽 0.5 米的行楷大字“双寿同珍”贺寿，匠心独运，不落俗套。其实，古人擅长拆字，“珍”左边的“王”可拆为三个数字（一）（十）（一）即 $1+10+1=12$ ，右边“人”与“彡”可视为两个数字之和（八十）（三）即 $80+3=$

83, 上下相加 $12+83=95$, 恰似“九五之尊”, 故借“珍寿”祝福寿达 95 岁。

目力所及, 清代匾额的题款格式大抵有两种: 第一种是题匾人将自己的身份题在上款(或称右款), 第二种是将受匾者的身份及题匾原由书于上款。这块匾的题款属于后者, 款识文字放大后大体可辨。上款为“恭祝玉翁年长兄白老先生、德配白母王老夫人”; 下款是题匾人身份“钦命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光禄寺少卿、提督湖南学政加三级年家弟刘彬士”。美中不足的是, 下款的刘彬士印和闲章均已脱落。

受匾人白玉翁何许人也? 刘彬士为何给他题匾? 从上款的称呼得知, 白氏是刘彬士的“年长”。这里的年长不是单纯年龄大一些, 而是科举同科或同榜取得功名的专有名词, 诸如年长、同年等。也就是说, 他们同时金榜题名, 只是白氏比刘氏年龄大。作为“同年”, 大抵有三种可能: 同科秀才、同科举人或同科进士。经查《明清时代湖北进士题名录》, 在明朝创下 136 名进士奇迹的麻城县, 在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的进士榜上, 没有发现白氏的名字。而根据当时黄陂与麻城分属汉阳府与黄州府的不同行政区, 刘彬士与白氏不可能是同科秀才。据此分析, 他们只有一种可能: 同科举人。而下款中的“年家”, 则是同年登科者两家之间的互称。

“双寿同珍”

匾颇具艺术、文化、社会和历史价值, 原主人是麻城中馆驿镇浦兴集村的王远倭, 由此看来此匾悬挂于白玉翁夫人王氏的娘家。

“木本水源”桑梓情

匾额作为“门楣上的家国, 梁柱间之文脉”, 以匾研史, 可以佐证传主的行谊。在黄陂清凉寨景区刘家山村发现的刘彬士题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木本水源”匾就是如此。

“木本水源”这一成语, 意指树的根本、水的源头。典出《左传·昭公九年》:“我在伯父, 犹衣服之有冠冕, 水木之有本原, 民人之有谋主也。”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 更是点明主旨:“天下未有无根之木, 无源之水, 未有无祖宗父母之人。”这正好是对刘彬士怀念祖根的最好注释。

当年山民告知, 这块匾历经风雨百十年, 成为刘家山村的镇山之宝。日军占领黄陂期间, 一次为搜索抗日游击队, 烧毁了整座刘家山村, 存放于刘家祠堂的物品几乎焚毁殆尽, 唯独匾额掩埋在瓦砾之下逃过一劫。

抗战胜利后, 刘家山村保长家失火, 财物大都没有抢救出来, 但居然在灰烬之中发现存放其家的这块匾额, 几乎“毫发无损”。两次天灾人祸劫难, 匾额安然无恙, 让村民





黄陂蔡店街刘家山村老街

更加相信“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的儒家名言。因而，村民都对读书非常重视，并将刘家山村的一条河命名为“书香河”，河上石拱桥则称“状元榜眼桥”，纪念山村走出的清代文星刘彬士。

仔细辨认，这块匾的上款包括刘彬士取得的最高功名：嘉庆皇帝御赐的榜眼（殿试前三名状元、榜眼与探花均为“赐进士及第”）；主要职级：巡抚浙江、刑部左侍郎、诰授资政大夫等；名字：刘筠圃。现将此匾的上款文字摘录（模糊不清的用“□”表示）如下：“赐进士及第、□□浙江□□部院通州□□督部堂、现任刑部左侍郎、诰授资政大夫□筠□题。”

由于国民党当局 1949 年将一批清朝宫廷档案带到台湾，笔者两度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查阅馆藏档案，发现“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1886 号”之卷十五《刘彬士列传》记载了其生平履历。其中“2674-1 号、2674-5 号”记载，刘彬士在道光十七年前后的职务为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署）、刑部尚书（署）等。

又查阅《清史稿·职官·户部·总督仓场侍郎》得知，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又称仓场总督或仓场侍郎，是主管朝廷漕运粮食与全国军队粮草的正二品高官，官署设于通州。因为北京东南部的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终点，自元代以来就在这里设立管理漕运事务衙署。清代在通州设置户部坐粮厅署、仓场总署、漕运厅署等大小衙署数十处。江苏、浙

江、江西等漕运总局、会馆等亦设于斯。这是上款标有“通州”的缘故。而“诰授资政大夫”是道光皇帝颁授给刘彬士的正二品荣誉头衔。

作为题匾人的姓名与印章都会在款识中标明。此匾上款虽然有两个字无法辨认“资政大夫□筠□题”，但根据其前面的功名、官职身份与姓名的字与号，后四个字可确定为“刘筠圃题”。旧时，国人的名字大多包括本名、字与号，有的还有笔名。在清宫档案与《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明确标有“刘彬士，字辅文，号筱圃、筠圃”共四个名字。故此匾为刘彬士题写毋庸置疑。

曾几何时，有媒体称此匾是道光皇帝所题，实为一大误会。如果是道光皇帝所写，大都会盖有“道光御笔之印”的篆书印章，位置也有讲究，即盖在主题词“木本水源”正中上方。此匾没有发现此印及其痕迹。比对道光的相关手迹风格，也与此匾迥然不同。

下款文字“道光岁次丁酉孟冬穀旦”中的“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1837），这是立匾时间；“穀旦”即吉旦，旧时常以此作为良辰吉日的代称。《诗经·陈风·东门

之粉》云：“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毛传》解释“穀”为“善”，即美好之意。

目力所及，刘彬士题匾的书法是楷书与行楷兼用，“木本水源”是典型的楷书，表达自己对故乡父老的毕恭毕敬。“萱燦花甲”“淑德遐龄”二匾，均为榜书行楷，其笔法相似，彰显庄重与豪放之风；“双寿同珍”虽同为行楷，似有以拙为美的特色。

这四块匾因分别在湖北、湖南各地制作，工艺手法迥异。“木本水源”较简，似乎直接用油漆刷写，再用白漆勾勒文字笔划轮廓，让每个字与版面界线分明。“萱燦花甲”“淑德遐龄”“双寿同珍”三匾，都是阳刻木雕，棱角分明。所不同的是，“萱燦花甲”“淑德遐龄”直接阳刻木雕，没有刻意装饰。“萱燦花甲”为老母六十大寿的寿匾，竟是一块不加装饰的木雕版，彰显这位监察御史的古朴作风。相比之下，“双寿同珍”则采用了漆金包装工艺，当时可谓豪华气派，这也许是它至今保存完好的重要原因。

魂归故里不张扬

丧葬立碑和丧葬习俗是我国传统丧葬文化的核心。随着刘彬士的墓碑与匾额陆续在湖北、湖南等地重见天日，再次印证了他功成名就后仍乡情依依、清风长存的拳拳之心。从甘露山麓发现的刘彬士墓碑显示，他魂归故里后，其子孙遵其遗嘱，葬礼从简，只限于家祭。墓碑仅由子、孙二人所立，为后世留下了他不忘根本的实物证据。

2010年10月11日，在南北朝古城遗址甘露城之甘露山麓的前川街青凤村报告，陈家树咀湾（自然村）发现了一块青石碑。经文物与文史专家考证，这是刘彬士夫妇合葬的墓碑。



刘彬士墓碑 杜春华 摄

《吕氏春秋·节丧》载：“审棺槨之厚薄，营丘垄之大小，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墓碑作为墓上的重要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制度化和等级化。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其墓碑的大小、形状，甚至题字等，皆有明确规定。

早在东汉时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立碑，如《隶释》卷九有《故民吴仲山碑》。甚至儿童也有墓碑，如蔡邕就作有《童幼胡根碑》。墓前立碑没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墓碑形制也没受任何限制约束，尖首、圆首、圭首应需而设，整体风格充溢着古朴稚拙的时代气息，不像后世墓碑不看内容也能大致猜出墓主是何出身。但汉律对发展已成熟的“坟”却有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民百姓各有差。《盐铁论》记贤良说“庶人之坟半仞”，半仞就是四尺。至于帝王陵墓高度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在十二丈以上。《续汉书·礼仪志》记载：“汉武帝坟高二十丈。”

南北朝时期，墓碑设计开始注重逝者的地位等级，形制更精美华丽。而隋代法令规定：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龟驮碑，趺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至此，给墓碑的形制和大小作出规定。

刘彬士墓碑的整体外观形如倒立的“凸”形，上方主体为大长方体：长 1.95 米，宽 0.69 米，厚 0.24 米；下方有一小长方体石榫。据黄陂区文物管理所专业人员调查认定，碑体石材为青石，因全碑残为三截，上截主要是碑额浮雕，损毁严重，尚可看出有火珠、云纹等，也有两列文字“道光”与“封授”。

中截是碑文正文，除个别字模糊外，整体可辨；下截正文“之墓”十分清晰，尾款孙子的名字模糊不清。通观碑文可以确认：墓主人为刘彬士及夫人，立碑人是其子、孙，立碑时间为道光十九年（1839）金秋。墓碑左右两侧为龙凤呈祥图案。

碑上的四列文字如下：右款“道光十九年九月吉旦”。正文“封授：荣禄大夫，署刑部尚书、左侍郎刘公讳彬士大人；一品夫人刘母郑氏夫人之墓”。左款“孝男 诚倬孙□□恭立”

右款标注的是立碑时间“道光十九年九月”。刘彬士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退休后病故，于隔年安葬，符合当地的“当年丧隔年葬”民俗。立碑时间大都选在农历三月清明节，也有选在九月重阳节。刘墓立碑选在九月，还有一种可能是其夫人病故于道光十九年上半年或“七七”之后，择定于当年九月夫妇合葬。

正文的“封授荣禄大夫”缘何排在最前面？这是因为刘彬士身后道光皇帝追授的正一品优赠荣誉头衔，比“木本水源”匾上

的正二品衔“资政大夫”高一等级。紧随其后的“署刑部尚书”（从一品）、（刑部）“左侍郎”（从二品）是刘彬士生前道光十八年的实职。又因刘彬士追授正一品大员，所以其夫人“郑氏”在碑文上自然为“一品夫人”。

墓碑是嫡子刘诚倬及孙子所立。刘诚倬，号稚筠，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历任户部郎中、山西泽州知府等，为官清廉卓异、以礼义待人著称。

旧时的墓地（阴宅）如同住宅一样，选址颇为讲究，大都靠山面水，以显根基稳固、气场流通。陈家树咀湾背靠甘露山，面朝潏水及开阔的平畈，刘彬士的本家刘家大湾也在附近，这是刘氏祖坟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陈家树咀还拥有青云寺，并与甘露寺同祀程朱理学的开山程颢、程颐，这是墓地选址的文缘。

由此可知，刘氏一门走出父子两位进士，又是清正廉明、尊老爱亲、子孝孙贤的忠孝节义之家。他们的行谊，通过形制古朴、书法精湛、内涵深厚的匾额与墓碑传之于世。

裴高才，黄陂区委统战部原调研员；
杜春华，黄陂区政协常委、民盟黄陂工委
副主委

武汉起义将领张轸相关史实补正

◇ 张胜林

张轸是武汉历史上的名人，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他率部在金口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为武汉和平解放作出贡献。

关于张轸的生平，相关记载可谓不少，但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探析。

1. 张轸率部起义的官兵究竟是多少？

目前所及的武汉史志书，均称张轸起义官兵为“两万多”，但武汉地方报纸《大刚报》1949年5月17日的报道，副标题是“四万五千健儿投向人民怀抱”，正文也说是四万五千人，足见不是排版时的手误。

我们知道，这篇报道的消息来源一定由人民解放军军方提供，这既是权威的也是最

早的有关张轸率部起义的确切史料。说它权威，不只是军方来源，且与起义事发不过两天，非后世的传闻之词。

顺便说一句，《武汉解放战争史料》在引录《大刚报》这一报道时，有两处不合学术规范，亦可言是低级错误。其一，将原报道标题全部省略。其二，引文文尾交待史料出处为“摘自《大刚报》1949年5月6日”，显然是将“月”字误为“有”字，但即便是5月6日也仍然有误，《大刚报》的报道时间是5月17日。

2. 张轸在武汉会战及其前后任职如何？

《武汉市志·人物志》“张轸”条如是说：“抗日战争期间，历任豫北师管区司令、



述为湖北师管区；《武汉市志·人物志》张轸任游击指挥在当训练处长前，而《民国人物大辞典》在后，并且一言第二处，一言第三处。

此外，也有两点需要特别考订明确。

1. 张轸任第十三军军长的时间。

《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张轸任职时间为1938年4月，有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批复备案的

军队编制文书，内容是将第一一〇师与新编第五师合编为第十三军，“以张轸升任军长，吴绍周升任第一一〇师师长，原兼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免职。”

林森批复的时间是1938年6月7日。考虑到文书往来，先改编后报备，但两段时间相差不会差到两个月。查主管军队编制的军政部有关第十三军改编的报告，为5月14日起草，6月4日呈送国民政府，6月7日林森就签批了。显然，即便是按军政部报告时间算起，张轸任职时间也应是5月而不应是4月。

2. 张轸是否到任第十三军军长。

《中国国民党军简史》有述：“第13军军长汤恩伯（名克勤，以第20军团军团长兼）、张轸（字翼三，1938年5月11日继任）、张雪中（名达，1938年7月30日代理），隶属军委会，下辖第23、第110、第128师，中央军嫡系汤恩伯军事集团之骨干部队。参加了武汉会战。1938年6月8日，汤恩伯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由张轸继

第一一〇师师长、第十三军军长兼桐柏游击总指挥、军政部第二补充兵训练总处处长兼渝南警备司令、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六军军长、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参加台儿庄、武汉外围保卫战等战役。”

《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说法有所不同：“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同年任湖北师管区司令。1937年冬，任第一一四师师长。1938年4月，任第十三军军长。1939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任四川綦江新兵训练处第三训练总处处长。1941年11月，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六军军长，1942年调任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务。不久，任豫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7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12月任河南省新蔡行营主任，并兼第十战区副长官。1945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比较两书，有三处差别：《武汉市志·人物志》言为豫北师管区，《民国人物大辞典》



张轸

任军长。因张轸不是汤集团的成员，又未到职，故又以第89师师长张雪中代理军长之职。”文中有一处自相矛盾，括号中言张轸5月11日继任军长，后又说6月8日才继任。显然，作者将军政部报告大致时间与林森批复两个时间，都算为张轸任职的时间，此乃自乱其例。但此书却有一新说：张轸实际并未到任十三军军长。此点是否可靠，须参校其他档案资料。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武汉会战战史文书中，有第九战区电报数以百计，其中一件述1938年8月29日之事：“并以13A张轸部位于乌石街及其以东牛角泉大岭山一带，拟待18A到达后协同向瑞昌方面攻击。”9月24日，蒋介石命令铨叙厅表彰第十三军：“本会铨叙厅吴厅长查十三军张轸部此次在瑞昌以西正面力战，旬日以来，迭克要地，屡予敌以重创，而新三十五师师长王劲哉亲临前线督战，几陷于危，幸努力突围，稳定阵地，其公忠体国之精神，尤足可风，着将该军力战经过情形列表交由该厅议叙功奖，以昭赏罚而励来兹，

并仰将议叙情形具报为妥。鄂中24.10”

笔者推测，张轸若未参战，只挂虚名，表彰令中只述第十三军即可，不必将张轸姓名明白道出。再看当时战场电报，9月14日，张轸的上级汤恩伯向蒋介石报告：

“据张轸电：王劲哉率团在和尚脑阵地激战，受毒，伤亡惨重，及已令新三十五师派兵占领电打石、马鞍山之线为主阵地、太阳山堰山为独立守备据点等，各师部署……”观此电报，张轸到任并履行军长之职、实施战斗指挥

之责，及时就下属各师的战斗进行部署。

由此档案文书可知，言张未到任之说有谬。张轸指挥作战有功，因之表彰的不仅是第十三军且包括军长张轸在内。

观诸史证，可以认定张轸不仅到任第十三军军长，并在武汉会战时亲自指挥作战，且在江西瑞昌一带立下战功，从而得到嘉奖。我们在研究张轸这位武汉历史名人时，有几个关键问题不能不了解，也不能不提及。

张胜林，原武汉晚报言论主编，曾任江汉大学外聘教授

就读武汉市实验小学的美好时光

◇ 张智海

1956年，我毕业于武汉市实验小学六年级五班。这所学校位于汉口一元小路13号，很有“来头”，我在这里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

关于实验小学的“来头”，网上有说“创建于1945年，原为民国海军学校”，但查无依据。据“人文武汉”文史研究者侯红志考证（见《威廉学校旧照揭秘武汉市实验学校校史》），其前身是1917年汉口德租界威廉大街（1926年改名汉中街，1946年改名胜利街）上的威廉学校；1935年为江

岸地区第三十六短期小学；1942年为德国完全小学；1946年9月为汉景区第二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12月统一命名为汉口第三十五小学（一元小路13号）、第三十六小学（胜利街217号）；1952年三十五小、三十六小合并为三十六小；1954年11月改名挂牌武汉市实验小学，为市重点小学，直属市教育局领导；1960年增设中学部，改名武汉市实验学校。由此可知，武汉市实验小学名副其实存续时间仅为6年（1954—1960）。



1954年落成的三层教学楼

参加全市向日葵献礼大会

1950年，我从黄陂乡下来汉口，入读三十五小，与三十六小一墙之隔。记得是1953年，两校隔墙打开合一，一年后新的三层教学楼落成投用，开启实验小学时期，承担学制改革与教材教学实验任务。校长先是孟庆芳，后由副校长陈明锦接任，教学和各项工作严谨有序，从保留下来的学生手冊、毕业证书、运动会领队胸签等可见一斑。



颖阿姨指导,演唱电影《小梅的梦》主题歌《玩具歌》等,在学校操场广播中还听到过。

少先队在大队辅导员高莲珍老师带领下工作活跃,受到团市委少年部部长邓林欣的关注,成为少年部的工作重点。邓部长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业待兴,开学第一课,老师就教导我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学习。我是个刚来汉口的“乡里伢”,靠父亲拉人力车艰难养活一家五口,穷得连学费都交不起,所以学习格外刻苦。由于品学兼优,一年级下学期加入少先队,二年级开始当班长,四年级是少先队“二道杠”,五年级变成“三道杠”。

实验小学在社会上名气大、声誉高,学校常组织我们开展校外活动,如随音乐老师罗馨茹参加市里纪念冼星海逝世九周年音乐会,演唱《黄水谣》;随赵了兰老师去赵家条武汉一师联欢,演唱《荡秋千》;参加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由播音员胡

是南下女干部,年近三十,个子娇小,身着制服,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常来学校指导。有实验小学这张名片,加上高老师、邓部长的特别关怀和重点培养,使我有更多机会到社会上去见世面。如江汉桥通车典礼,成为“第一批过桥的人”,对现场采访的武汉广播电台记者谈感想;在海员俱乐部召开“武汉各界人民控诉刘和德反革命集团大会”,作为少儿代表发言;主持市少儿“小五年计划”大会、“向日葵丰收向祖国献礼大会”等。

那时一些小学周边有大块空地,团市委少年部听取倡议,号召各校利用空地种植向日葵,以培养学生爱劳动、爱祖国的情。1955年11月初,团市委在一元路市人大礼堂(今市政府礼堂)召开“献礼大会”,各校少先队代表带来大一袋小一包新收获的向日葵。大礼堂坐满孩子喜气洋洋,报纸、电台都作了报道,社会反响很好。我在献礼大会上的致辞,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后来《长江文艺》编辑部来函:“张智海小朋友,你的笔记本,我们从团市委少年部借来看了一下,现已看毕,特送还你,请查收。谢谢你。希望你努力学习,做好队的工作。敬礼!长江文艺编辑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那时党、团组织和社会对小学与少先队工作的重视。



加入少先队留影,平生第一张照片

见到英雄人物郭俊卿吴运铎

郭俊卿是女扮男装从军的“现代花木兰”，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全军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我国兵工事业的开创者，集兵工专家和作家于一身，名著《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两位后来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早在1950年代就家喻户晓，我有幸与他们面对面对接触。

1954年初春，得知郭俊卿作为荣军在汉口陆军医院（即后来的161医院）疗病养伤，我们四年级二班少先队16中队萌生与郭俊卿等荣军联欢的愿望。一场小雪过后，按班主任、中队辅导员陈谦言老师的嘱咐，我与中队委苏世斌冒着严寒，沿京汉铁路步行去郊区陆军医院联系。

联欢那天，16中队列队来到陆军医院，阳光洒满草坪，我们满心欢喜，围坐在郭俊卿和荣军代表身旁。郭俊卿20岁出头，梳着齐耳短发，和蔼可亲，虽经历严酷的战争还多次受伤，却难掩她的刚毅英姿，我们管她叫郭大姐。诗朗诵、唱歌、跳舞之后，郭俊卿以一口地道的东北话，绘声绘色讲述军旅生涯和战斗历程，我们听得聚精会神。那时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志愿军已陆续回国，我唱了一首少儿歌曲《我是一个小代表》，表达对志愿军的热爱之情：

“我是一个小代表，跨过了鸭绿江来慰劳，慰劳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叔叔你可好；一问你们身体健康，二

问你们家信可收到，三问你们精神愉快，四问你们日用品少不少……”郭俊卿和荣军代表和着歌声打拍子，把联欢活动推向高潮。

见到吴运铎，是在1955年六一儿童节那天下午，大队辅导员高老师对我说，团市委组织部分学校的三好学生代表，明晚在合作路江岸文化俱乐部听兵工专家吴运铎作报告，学校决定派你去。我一听大喜过望。因为我刚刚读过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深深被主人公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所感动，对吴运铎无比崇敬，激动得一夜都没睡好觉。

6月2日晚，我到文化俱乐部较早，报告会会场设在夜花园空地上，只见红旗、标语与彩灯、鲜花交映，一派节日景象。7时许，吴运铎来到会场，身着灰哗叽制服，显得瘦弱单薄，黝黑的脸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报告会开始，一名少先队员庄严上前向吴运铎敬礼，并为他系上红领巾。

吴运铎说的是带有乡土气息的普通话，从6岁参加儿童团讲起，到21岁参加新四军投身兵工事业，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不畏艰险，不顾安危，为研发试制枪弹



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 /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

多次身负重伤，左眼炸瞎，一条腿炸坏，四根手指炸断，仍以超常的意志和毅力，为兵工事业作出卓著贡献。他说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打出来的，勉励少年儿童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国家建设出力。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品德和革命实践，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印象，受教终生。

登上五一游行检阅台献花

1950年代，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都要举行集会游行庆祝。我参加了1954年的五一游行，还作为少先队代表（共20名）向检阅台上的首长献花。

当时，长江大桥和江汉桥尚未开建，武汉三镇18万余人的盛大游行，分别在汉口（11.7万人）、武昌（5万余人）、汉阳（1.3万人）举行；汉口是主会场，检阅台和观礼台搭建在解放大道中山公园对面的空地上（次年这里才兴建中苏友好宫），场景宏大。

五一清晨我赶到学校，随老师乘车到中山公园上首，各路人马正在解放大道上集结，少先队员在万松园路口整队。10时整，庆祝大会开始，市委书记、代市长王任重讲话后，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电。接下来，在雄壮激越的乐曲声中，游行以2600人组成的仪仗队为前导，高举五星红旗和各色彩旗，抬着马、恩、列、斯、毛、孙（中山）巨幅画像前进，步履整齐通过检阅台。

仪仗队后是2000多名少先队员组成的



检阅台上的首长和献花的少先队员（《长江日报》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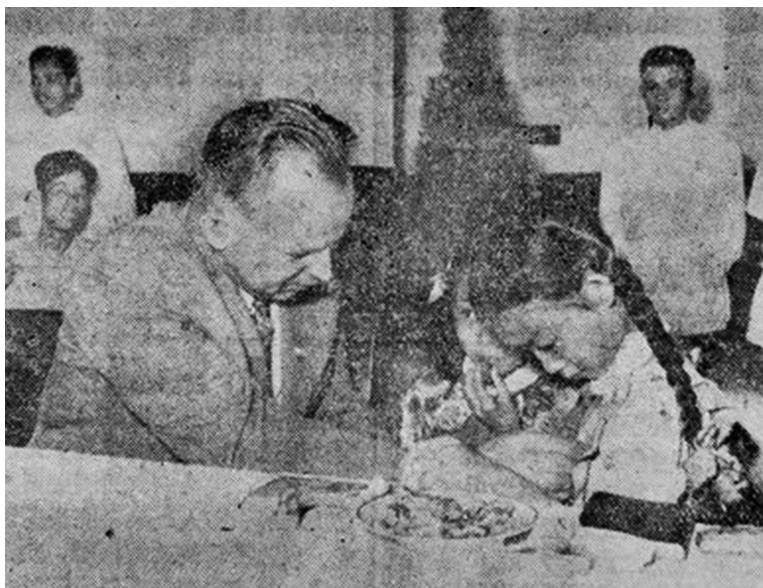
方队，手捧和平鸽和鲜花，其中有的装扮成工人、农民，抬着“我们是未来的王崇伦”“我们是未来的李顺达”的标牌，骄傲地走向检阅台。20名少先队员代表手持花束，离开队伍一路小跑到检阅台上，向首长们献花。同时，方队放出成群的和平鸽，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在献花的20名少先队员里居中，问“首长好”敬礼献花。我面对的是一位个子较瘦高的中年首长，他微笑着接过花束，亲切地在我肩上轻轻拍了拍，然后我们就站在首长跟前观看游行。

两天后看《长江日报》，才知道接受我献花的首长竟是王任重，时年37岁。他的右边是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赵毅敏，时年50岁；左边白胡子老人是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时年80岁。检阅台上还有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王树声（49岁，次年授衔大将）、中南空军政治委员吴富善（42岁，次年授衔中将）……这次献花，能见到这么多革命前辈并与他们同框，是我们的幸运和荣光。

获得苏联展览会专家题词

1956年5月3日，在中苏友好宫开幕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绝对是



斯莫里扬诺夫给少先队员佩戴纪念章

全市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和喜事。三镇街头和公共场所，到处可见展览会海报，上面是红星照耀下的16面红旗（代表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展会为期两个月，第一个月观众就达110.3万人次，盛况空前。

展览会期间，苏方不时举办招待会，招待湖北省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参观团、省（市）先进生产者，还召开座谈会交流经验。六一儿童节之际，特邀武汉少年儿童代表到展览会作客。2日下午，邓林欣部长带领我们各校少先队代表16人来到中苏友好宫，参观文化艺术馆后与苏方人士联欢。二楼一间富丽堂皇的厅堂，椭圆型会议桌上铺着洁白台布，摆放着精致的苏联糕点和花花绿绿的糖果，还有桔子、香蕉等水果。我们与苏方人士穿插而坐，随意而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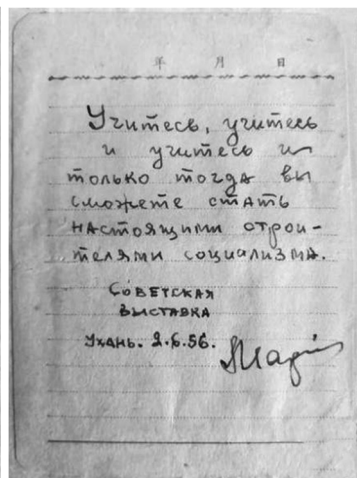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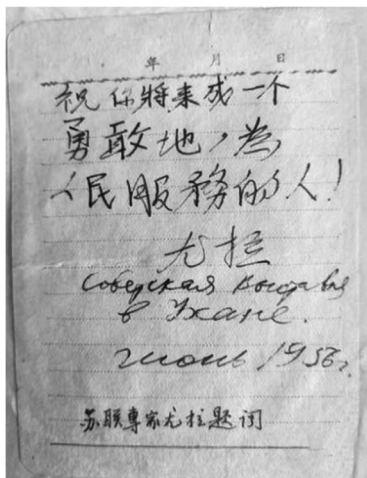
苏联展览会主任斯莫里扬诺夫致欢迎辞，到会专家有石油专家朴莫斯科娃、矿山专家安纳普列奇柯夫、职业教育专家古谢夫等。一

位苏联专家讲话后，我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发言，然后相互交流，气氛轻松欢乐。会上，我们都得到一枚展览会纪念章，斯莫里扬诺夫还走过来，帮一个少先队员把纪念章别在胸前。

坐在我右边的苏联专家约30来岁，会讲不太流畅的华语，告诉我他叫尤拉，拉脱维亚人，从事教育工作，第一次来中国，武汉人民的热情让他十分感动。他很有兴趣地向我了解学校和学习情况，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请他题词。他拿出钢笔，不

假思索地用中文写下：“祝你将来成一个勇敢地，为人民服务的人！尤拉 1956.6.2。”

坐在我左边的苏联专家年纪稍长，不会华语，所幸有尤拉在一旁帮忙翻译，与他作了简单交谈。这名专家也热情的用俄文为我题词，尤拉解读其意思，可过后不久就忘了。这一忘就是60多年，直到几年前求助“百度知道”，一位网友帮助翻译出来，全文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苏联



两名苏联专家的中文、俄文题词

展览会(19)56年6月2日武汉。”可以说,这是那时中苏两国人民思想情感相通的一个例证。

岁月流逝,一晃70年过去,每当我看到保存下来的苏联专家题词和糖纸,就想起那场空前绝后的苏联展览会,想起做客中苏友好宫与苏联专家联欢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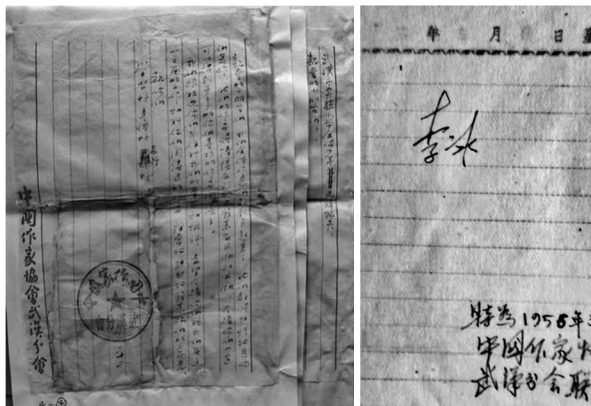
致信武汉作协反映“少儿书荒”

我保存的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的回函和著名诗人李冰的签名,也有故事可说。

1955年,组织课外读书活动是少先队的一项工作,而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籍却很少。经大队辅导员高老师提议并指导,由我执笔以全校少先队员的名义,致信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反映少儿读物稀缺的问题,请求作协发动作家多为少儿写作。很快就收到回函,4页约1700字,盖有公章。回函检讨“对少年儿童太不关心,对儿童文学创作冷漠”的不足,表示诚恳接受批评,采取有效措施动员作家积极写作,以迅速改变少儿读物奇缺现象……字里行间充满真情与关爱。

高老师看过回函后,要我召集队干部学习并负责保管,没想到这一保管就是六七十年。鉴于此信已成稀有文物,6年前我准备赠给原武汉作协主席董宏猷。董宏猷看过拍照后说,我不能受人之爱,送给我或捐赠作协,都不如由你保管好。

李冰是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诗人,1939年14岁时参加革命,1944年赴延安加入鲁艺学习,1946年由著名诗人贺敬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南下开封、武汉,历任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作协中南分会、武汉分会党组成员和主席团委员。



武汉作协的回函和诗人李冰的签名

团市委少年部组织部分少先队员会见李冰,意在让孩子们接受文学熏陶,地点在汉口黎黄陂路一栋红砖小楼,那里是作协所在地和《长江文艺》社址。

李冰当时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着中山服。会见过程和趣事难以细述,最精彩的是我们当着诗人的面,满怀深情朗诵他的代表作《大娘》。李冰1941年创作短诗《大娘》,源于一次他赴张家口途经长城边上,住在一位老大娘家。老大娘有个儿子参加八路军牺牲,每逢队伍经过,她都要站在大门口目送,把子弟兵当成自己的儿子。李冰夜不能寐,写下《大娘》一诗,结尾是这样的:走到村边再回头望,大娘还站在大门上,辛苦的老人,子弟兵的亲娘,风丝丝吹乱了灰白头发,刚强地站在长城边上。

朗诵《大娘》,使会见活动进入一个特别意境,诗人脸上露出欣慰之情。我拿出小日记本,他在上面签名,成为少先队员与诗人互动的一个证物。

张智海,原武汉市城建委副巡视员

1994年，偶遇“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永曦

◇ 罗建华

1月28日午后一开手机，“文史之友”公众号跳出《翁永曦辞世，“改革四君子”与80年代珠璧交辉》讣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翁永曦先生于1月27日下午6:06病逝，享年78岁。”

太意外了，仅仅一周前的21日，我从日记中看到一段30多年前的记载，不由落笔为一篇忆文，不想转眼变成了悼文。

翻开1994年12月10日（星期六）日记，往事如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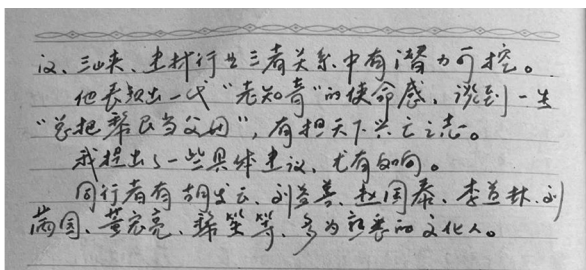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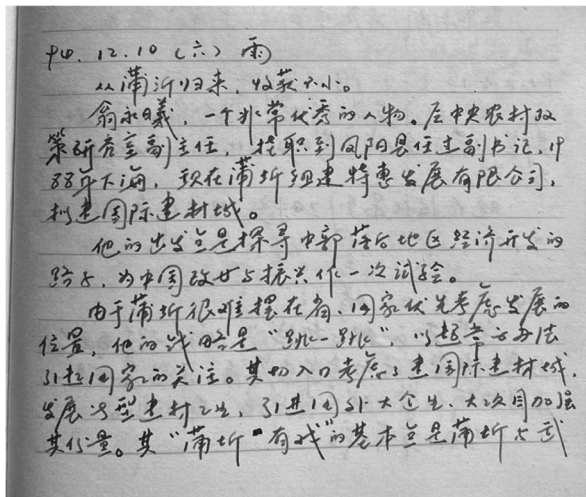
从蒲圻归来，收获不小。

翁永曦，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挂职到凤阳县任过副书记。1988年下海，现在蒲圻组建特惠发展有限公司，拟建国际建材城。

他的出发点是探寻中部落后地区经济开发的路子，为中国改革与振兴作一次试验。

由于蒲圻很难摆在省、国家优先考虑发展的位置，他的战略是“跳一跳”，以超常的办法引起国家的关注。其切入口考虑：





建国际建材城，发展新型建材产业，引进国外大企业、大项目加强其分量。其“蒲圻有戏”的基本点是蒲圻与武汉、三峡、建材行业三者关系中有潜力可挖。

他表现出一代“老知青”的使命感，谈到一生“总把黎民当父母”，有担天下兴亡之志。

我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尤有反响。

同行者有胡发云、刘益善、赵国泰、李道林、刘满园、董宏量、黎笙等，多为熟悉的文化人。

翁永曦气质文弱，头发已见稀疏，有人小声提示，他是此前非常红火的改革题材电视剧《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原型，我一下还难以将他与扮演者周里京的硬汉形象联系起来。但他的言谈举止，儒雅中透着干练，就是那种高层“智囊”的风度。我调入长江日报前，供职于武钢调研室，“智囊”正是尊敬并追求的对象。

翁永曦没有一点官场气味，就一个谦谦君子，说话低声细语，谈论高屋建瓴。他的妻子正好来探亲，高个儿，北方人，知识女性风采，爽劲大方又不失书卷气，记得介绍说是律师，担任北京海淀区司法局副局长，下面有人小声感叹“一看就是高干子女”。

进餐时余热未息边吃边聊，大家关注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态势，从《新星》的故事情节论及诸多难点，气氛颇为热烈。席间，翁永曦与妻子站起身，合唱一首《明天会更好》，说是对大家表示谢意。夫妇击掌打着拍子配合默契，不时二目相视颌首含笑，饱有对来蒲圻创业的憧憬。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挺喜欢“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至今回想仍是一幅富有激情的美好画面。

2008年，王岐山步入中央领导层，媒体出现“改革四君子”——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黄江南之说，一下激活我与翁永曦“一面之缘”的记忆，小有“原来是他”的兴奋。

想来，翁永曦当年“下海”来蒲圻（今赤壁市），是胸怀一番抱负的，是在继续为改革发展探路，并从他在行的农村政策研究，跨界到他陌生的兴办工业实体——尽管这个国际建材城后来未能风生水起。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翁永曦当时已经清醒意识到一个非常具体的“瓶颈”问题，即长江大桥的铁路限制了列车“北煤南运”的运行班次，而建材工业偏偏是“吃煤大户”，他考虑怎么设法争取铁道部的支持，通过增加“红旗列车”等特殊办法来解决。

日记中说自己“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尤有反响”，有些大言不惭。那是因为在武钢

工作时，参与起草武钢发展战略规划，其中三峡、浦东“两点”和长江沿江、东南沿海“两线”，与翁永曦构想的国际建材城有重合之处；同时，武钢冶炼的大量废渣也可利用来作生产建材的原料，因此建议其与武钢洽谈合作。大约针对性较强吧，受到一点好评而已。

我们一行到蒲圻，相当于一次文化采风活动，日记列出的名单上，大都是武汉知名作家且“行当齐全”：小说家胡发云、刘益善，报告文学家黎笙，诗人李道林、董宏量，评论家赵国泰；刘满园和我则是媒体人，她在《爱情婚姻家庭》杂志当编辑，热衷写当时流行的“女性散文”；而我38岁年纪最小，刚在《长江文艺》《当代作家》等刊物发表几篇小说，也写些纪实作品。

名单上缺了一位关键人物雷子明，他是词作家，担任武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转业前是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创作组组长，与我所在的长江日报周刊部联系较多。他原籍蒲圻，受家乡之托组织这次活动，此前联络成行时，我已在日记中留痕。

我们参观交流后，一同游览蒲圻陆水湖风景区，虽然天气不佳细雨濛濛，但一路指点风物谈笑风生。说到历史上朝代兴替，翁永曦与黎笙感叹“还是老百姓最苦也最识大体”，我觉得深刻而掏出采访本。

道别之时，翁永曦没有提出任何宣传推介方面的要求，此后未见有谁发表相关作品，我记录的素材也没有派上用场，隔山隔水化为今天的缅怀。一次偶遇，收获了思想激荡，见识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

翁永曦197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内蒙大草原插队的地方，干到大队党支部书记，1979年进京当上《农民日报》记者，还是不离“农”。这样的人生磨砺，深知农



1980年代的翁永曦

民疾苦，熟悉底层逻辑，为他后来致力于农村改革提供了多重实践体验，以其思考和胆识，跻身“改革四君子”之列。

2014年8月22日，凤凰网历史频道播出“对话翁永曦”，翁永曦的回忆颇具戏剧性：“1979年国家对上山下乡的大学生重新分配，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给我发了个通知，让我到农民报报到。我是在1979年10月份去农民报上班的，工作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有一天社长苗沛石在记者部门口问，谁闲着？去给农委杜润生主任送一份明天报纸的社论，让他审查好见报。小翁干嘛呢？我说没什么事。他说，那你骑自行车送去吧。到了杜润生办公室，杜老正埋头在写东西，我说，杜主任，苗社长让我把明天的社论送给您审查。他抬头看看我说，没见过你啊。我说我是新去的。杜老问原来是干嘛的？我说原来在农村插队。杜老问在农村插队多长时间啊？我说前后10个年头

8年整。杜老问这么长时间有什么体会啊？我说农村太穷，农民太苦，现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过大，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杜老看我一眼说，这算一条，还有第二条没有啊？我说有啊，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到了农村以后才知道，无论经济还是自然，从来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杜老又看我一眼说，你把社论留下，我看完了派人送回去。一个星期后，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的调令，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由此，翁永曦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大潮中，释放他在基层积累淬炼的智慧能量。1982年，35岁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有了能发挥更大作用的舞台，也刷新了全国最年轻副部级官员的记录。1990年机构改革，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翁永曦毅然选择“下海经商”，又是公务员中级别最高的弄潮儿。

如今上网搜索，关于翁永曦的信息仅寥寥数条，且内容简短，称之为经济学家、企业家，担任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等职。

从有限的资讯可以感知，翁永曦依然情系“三农”问题，近年以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顾问身份，参与过“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活动，就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翁永曦曾是新闻人，他当年好像并未提及，但今天让我感到多一分亲切。如果他不来蒲圻创业，很难会有这样的偶遇。时光虽已过去30多年，我的感受是切切实实的——“他表现出一代‘老知青’的使命感，



谈到一生‘总把黎民当父母’，有担天下兴亡之志”。

“文史之友”的讣闻，对翁永曦无一字评价，只是紧接一行“挚友朱嘉明先生撰写挽联寄托哀思。上联：自称五百半（即 $500/2=250$ ），胸襟豁达，才思慧敏，仁爱本色，举手投足无欲无求；下联：世评大丈夫，起落无悔，负重致远，初衷不改，殿堂江湖立德立功。”

朱嘉明乃“改革四君子”之一，对友人知根知底，他的挽联无疑是对翁永曦的最好嘉许。

永别了翁永曦，一代改革前行者远去，“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时代会记取一缕曦光。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罗建华，长江日报高级编辑

黄鹤楼古铜顶和胜像宝塔二谜

◇ 张胜仪

铜顶何人铸

古铜顶即清同治黄鹤楼楼顶，系清同治七年（1868）秋末，武昌知府黄昌辅主持重建黄鹤楼时下令铸造。传统学界认为，古铜顶由以周天顺为主的多家炉坊共同铸造。这一说法在湖北省地方志、武汉市地方志及周家后人的回忆录中，均有相关记载。

近来有学者传拓修复后的古铜顶荷叶形托盘时，发现其中三瓣铸有铭文，分别为：“大清同治戊辰嘉平月吉日”“王天□炉坊 □匠王□治”“沐……”。这些到底传递了哪些信息，“王天□炉坊”指的是哪家炉坊呢？

为解开古铜顶的身世之谜，我开始广泛搜索相关资料，进一步了解其历史。据资料记载，周天顺家族世代以经营炉坊为业，铸造工艺已具相当水平，享有盛名。官府经“招标”，选中周天顺炉坊铸造铜顶。铸造如此巨大的铜顶，需多个炉子同时冶炼浇铸。周天顺炉坊为顺利完成任务，邀约多家炉坊参与其中，动用许多工匠同时铸造，一气呵成。

然而，并非所有的记载都如上所言。辗转几番，我终于在王守先所写的《三百年家史》中找到“王天□炉坊”的相关记录，其中记录王天泰通过“投标”得到古铜顶的铸造权。据该书记载，王家世代清贫，爷爷的高祖王继茂从事家庭手工业，其子王宗鸿觉得没有发展前途，因此咸丰初年在汉口沈



家庙创办了王天泰炉坊。到同治七年，经过多年发展，王天泰炉坊已进入经营稳定、铸造工艺成熟的阶段，具有一定竞争优势。

古人在铸造青铜礼器时，常加铸铭文以记铸造该器物的缘由、所纪念或祭祀的人物等，往往记录了制作的时间、地点、工匠姓名、作坊名称等。通过解读荷叶形托盘上残余的铭文可知：“大清同治戊辰”指清朝同治七年，即1868年；“嘉平月”是农历十二月的一种别称，“吉日”就是吉利的日子；“□匠王□治”应指某个工匠姓名。而其中的“王天□炉坊”，应为“王天泰炉坊”，这为其参与铸造古铜顶提供了确切的佐证。

然而，荷叶形托盘一共六瓣，目前传拓发现仅三瓣铸有铭文。原来，自光绪十年（1884）同治黄鹤楼被焚毁后，古铜顶长期被遗弃在蛇山上。此后接连两次遭劫，受到严重损毁。1984年，在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的努力下，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原貌。

于是问题来了，古铜顶到底是王天泰炉坊独家铸造，还是和周天顺炉坊等多家共同铸造呢？我们进一步请教历史学者和文

化专家，考虑到古铜顶两次遭劫受到严重损毁，目前传拓出的铭文能否完整反映历史，还有待商榷。若仅因此就推翻传统学界的研究，尚显武断。

最终，我们采取全面客观严谨的态度，将传统观点和最新发现综合表述，交由后人继续研究。无论如何，古铜顶的成功铸造，都反映了当时武汉的冶炼技术已位列全国一流水平。

宝塔何人建

黄鹤楼前的白塔为胜像宝塔，俗名“孔明灯”，因系石灰石所砌，历经风雨剥蚀而泛白色，故又有白塔之名，原立于黄鹤矶头。

据《湖北通志》《黄鹤山志》和《寰宇访碑录》记载，胜像宝塔建于元惠宗至正三年（1343），主要是用于供奉舍利和安藏佛教法物的喇嘛塔。原址塔周围有护栏，南向曾有一石牌坊，匾额上横书“胜像宝塔”四字，每字六寸见宽，上款题“威顺王太子建”，下款为“大元至正三年”。

那么，这里的威顺王太子是谁，这里的太子含义又有何不同？

经查，元世祖忽必烈有十个儿子，其中第九子为镇南王脱欢。威顺王为忽必烈之孙、脱欢之子。据《元史》记载，脱欢曾两度奉命征战越南，但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认为其丧师辱国，十分恼火，下令其终身不许入朝进见。

后来，脱欢受命镇守武昌，但并未足履武昌之地。脱欢有六个儿子，分别为老章、脱不花、宽彻普化、帖木儿不花、蛮子、不答失里，其中宽彻普化为脱欢的第三子。元泰定三年（1326），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将鄂汉（武昌、汉阳）之地封给宽彻普化，并封



威顺王。从此，蒙古藩王开始了对武昌的黑暗统治。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感到疑惑，镇南王脱欢和宽彻普化都只是镇守地方的诸侯王而已，压根谈不上是太子的继承人，胜像宝塔的题文“威顺王太子题”，在逻辑上似乎有些说不通。

确实，古代太子一般指由现任皇帝依法定程序确认的皇位继承人，一般为嫡长子。然而，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游牧狩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无了解。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心存隔膜，不理解“太子”的内涵，著名的政治安排“武仁授受”，就将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元武宗海山立自己的弟弟寿山为“皇太子”，并约定等寿山百年之后，再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正因不谙中原礼法，才闹了弟弟是哥哥“太子”的笑话。可见，元朝的汉化程度很低，无论是

威顺王太子，还是威顺王的太子，这里的太子是指世子即诸侯王的儿子。

针对胜像宝塔“威顺王太子建”六字，学界现存两种观点：一为威顺王宽彻普化本人所建，一为威顺王的太子也即宽彻普化的儿子所建。按照第一种观点，建塔者是“威顺王太子”，这里应指宽彻普化本人，他曾被封威顺王，镇守武昌、汉阳之地，建塔时也在世，这么说并无违背逻辑之处。按照第二种观点，如果建塔者是“威顺王的太子”，那么应指宽彻普化的儿子，在逻辑上是否说得通呢？

经查史料，宽彻普化有六个儿子，分别为别帖木儿、答帖木儿、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及和尚，其中别帖木儿年龄最长。“威顺王的太子”指威顺王宽彻普化的法定继承人，建塔时六子均还在世。虽然，长子别帖木儿在至正十一年（1351）被俘，但相较建塔年份晚了八年，也基本合乎逻辑。

元朝时期，喇嘛教十分流行。威顺王宽彻普化（或其子）是蒙古贵族，为尊教拜佛修建白塔，与历史背景相切。宽彻普化父子在武昌期间，恣意享乐鱼肉百姓，曾在蛇山上修建奢侈豪华的广乐园。时至今日，虽然广乐园基址已荡然无存，但胜像宝塔留下其父子统治武昌的历史见证。

张胜仪，武汉黄鹤楼公园文博馆员